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最时髦的怀旧复古国家

口袋旅行笔记

TRAVELS

世界遗产地理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最时髦的怀旧复古国家

口袋旅行笔记

TRAVELS

世界遗产地理



目录

重返古巴：寻找革命的背影
古巴：废墟曾经辉煌
走出历史的古巴
哈瓦那：冻结在胶囊里的时光
“红色的切”世界偶像制造
圣地亚哥：古巴革命的背影
经典作家的古巴时光
特立尼达：苦与甜的迹忆
革命前传：古巴的殖民历史
智慧谷：为全世界种植甜蜜
电影揭开古巴神秘面纱
推开关塔那摩地狱之门

版权信息

口袋旅行笔记：最时髦的怀旧复古国家

《世界遗产地理》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2017© 中华文化促进会联合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7

本书版权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P-N00009977-20170419

最后修订：2017年05月05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重返古巴：寻找革命的背影

当政治和军事上的妖魔化被拨乱反正，革命的古巴已渐行渐远。打开互联网，古巴的旅游信息比比皆是。手持中国护照，还可以免签进入古巴。而对峙了半个多世纪的古巴与美国，也开始冰释前谦。从全世界各地抵达古巴的人们发现，传说中“仿佛静止在70年代的老挂钟”——古巴，复古的气质依旧，革命遗迹仍在，但是时间已经开始向前走动，不再停摆。重返古巴变成一种时髦风尚，它张开双臂，欢迎衣衫褴褛的革命怀旧者，也欢迎体面的怀旧贵族……



• 老爷车缓慢行驶在哈瓦那港口的防波堤上。这最具古巴气质的画面，还有那些革命的传奇，吸引着人们重返古巴。摄影/**JOSE GOITIA-Figaro Photo-DragonImage**

猜你喜欢

WORLD HERIITAGE GEOGRAPHY

世界遗产地理

LATINA

AMAZING AMERICA

赤足天堂

拉丁美洲



点击阅读

古巴：废墟曾经辉煌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古巴似乎是一面穿越时空的镜子，能照见曾经的中国。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张翎曾三次前往古巴，去怀旧，去寻找革命扫荡过的瓦砾，以及渐行渐远的理想。但古巴却并不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缩影般那么简单，它有自身的气质和故事……

撰文/张翎



● 鳞次栉比的古老建筑，构成了怀旧的古巴。热情的舞者、缓缓驶过的老爷车，是划过这城市的一抹亮色。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2010年到2015年间，我去过三趟古巴。面对朋友们的好奇，我一成不变的解释是性价比：用七八百加元的代价，逃离北国的寒冬，享受一整个星期食宿全包的阳光海滩，的确是一桩钱包和身体都感觉舒适的交易。

只是还有一个原因我一直没敢说，怕说了显得矫情。我其实是怀旧去的。我的怀旧，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个旧，那时我刚出生。也不是60年代的那个旧，那个时代让人心惊，我不想去触碰。我怀的那个旧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么短短的三五年。那个三五年里，包围所有人的那道铜墙铁壁裂开了细细一条缝，趴在那条缝里看世界，是一种放大变形了的新奇。那个年代里的我，还有我身边的许多人，都对未来怀抱着一些朦胧的憧憬和希望，你甚至可以把它称之为理想（说到这个词我忍不住羞赧难堪）——尽管后来我很快知道那些玩意儿都是年轻和无知的伴生物。

那几年的时光瞬间即逝，成为了我记忆中永恒的亮点。古巴兴许是如今世界上残存的唯一和那个年代略具相似之处的地方，于是我就一次

又一次地走向那里，反复经历着探险，寻求惊讶和失望。对于古巴来说，我至今还处于出发了却尚未真正抵达的状态——我一直还在路上。



● 古巴街头的堆沙标语："要古巴"，下句是"不要美国佬"。摄影/张翎

土地：被红与黑同时遗忘的灰色角落

古巴人形容自己国土的形状时，最经常使用的一个意象是鳄鱼。的确，古巴从地图上看像是一条头朝下浮游在佛罗里达海峡、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之间的鳄鱼。这三片水域给予了古巴绵长的海岸线和源源不断的旅游资源——这在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断粮岁月里救了卡斯特罗一命。

这条叫古巴的鳄鱼，在躺着不动的时候就已经得罪了人：它的尾巴几乎扫到了一片打个喷嚏地球就要颤抖一下的国土，这片国土的名字叫美利坚合众国。古巴离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Key West)最近处只有150公里。150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假若你把水域想象成陆地，那是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假若你把想象力如橡皮筋那样地扯开，就能想到一个体力中上乘的汉子骑自行车早上从古巴出发，马不停蹄，天黑就可以抵达佛罗里达。

150公里是个有点小意思的数字，没到这个数字时人还太癫狂，过了这个数字人或许就过于理智，而只有正好在这个数字上时，人才能有些癫狂而又不至于完全丧失理智。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块状似鳄鱼的土地上的人总想驾着各样的船只，冲击一下150公里这条线，因为他们知道过线的机会是一半对一半。我在古巴的三次旅行中很少尝到海鲜，除了在专门对外国人开放的高级餐厅里，后来才知晓，这

也是那150公里惹下的麻烦——卡斯特罗政府对出海的渔船控制极严。

我第一次逗留的那个地方叫巴拉德罗（Varadero），它是“鳄鱼”脊柱尾端向海洋延伸出去的一个细长半岛，最宽之处也只有1.2公里。从下榻的宾馆往前走，过一两条街就是海；往后走，过一两条街也是海，我们居住在一个被两片水域夹住的大约两三百米宽的狭窄陆地上。那一个星期里，天一直在耍着小性子，北国的风雪刚刚被我甩在了身后，可是南国的艳阳也并未向我招手。在12℃的风里行走时，身上的夹克衫瞬间感觉薄如蝉翼。风是从两个方向交错而来的，仿佛两边的水域在轮着番叫阵。那时印尼海啸的印象依旧鲜活，任何一丝可疑的声响都会让我生出莫名的惊悚，总觉得这块两三百米宽的陆地还不够海啸轻轻舔上一口。

我们抵达巴拉德罗是在夜里，第二天便是元旦了，我们在古巴睡过了一年。早晨走出门来，吧台的帅小伙们已经在调鸡尾酒了，工作人员正在挂满彩饰的舞台上调试麦克风。昨夜的狂欢尚未睡下，今天的狂欢已经起床，可是我对狂欢兴趣索然。我可以在别的地方轻轻松松地找到比这里更好的酒，更精彩炫亮的歌舞，甚至更细软、洁净的沙滩，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寻找奢侈——奢侈早已移居他乡。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些别的地方所没有的东西，比如说革命的飓风扫过之后的瓦砾；再比如说我的故国在这里留下的痕迹。毕竟，我是听着《美丽的哈瓦那》的音乐长大的，我也是哈瓦那的孩子。

其实在下飞机的第一眼里，我们就已经看见了中国的印记。在机场和涉外宾馆之间穿梭行走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宇通大巴，连门楣上的安全提示都是未经翻译的中文。巴拉德罗的街面上找不到红绿灯。他们用不着，因为街上几乎没有小汽车。偶尔开过一两辆，也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老爷车——那是几十年里西方禁运的直接后果。后来在哈瓦那我们终于看到了车水马龙的场景，却依旧是同样的老爷车，只是颜色漆得光怪陆离。看见宇通巨人般地在缺乏同伴的巴拉德罗街头横冲直撞，不知怎的，我感觉有些扎眼。

我们在宾馆餐厅的厨子眼里，也依稀看到了中国。那是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脸上泛着一层与阳光和炉火相关的红油。据说旅游业是古巴人梦寐以求的高收入行业，我不知道在聘用的过程里是否有“政审”一说，只是我没有在这个女人的脸上找到任何类似于优越感的表情。我用英文问候她，她用西班牙语回应我。即使是涉外宾馆，工作人员也几乎不讲英文。我总觉得这与教育水准无关，这里牵涉的其实是姿态和立场。“Chinos？”她问我们。怕我们听不懂，她又用油腻腻的双手将眼角往上扯了一扯。这是欧美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在他们看来我们个个都是吊眼。这个手势在美国和加拿大会立即被解读成种族歧视，而在这个女人眼中，我看到的只是善意。我掏出一块硬币塞到她的手里，她收了，并无扭捏之态。女人的手很粗糙，我猜想一天中最耗费她心神的事，大概是怎么把那点少得可怜的肉，做出看上去比实际重量多的菜肴。

天还早，街上的人群却已经开始聚集，房屋之间的空地上站着一些喝啤酒弹吉他唱歌的人。孩子们跑来跑去，每一个路口都能发现几条铺开四肢酣睡的狗——它们从未经历过汽车的惊吓。今天是难得的假日。我心想。可是我错了。第二天，第三天，还有以后的每一天，他们几乎天天如此。他们似乎永远不用上班，可以喝着啤酒把一首歌唱到地老天荒。上帝在创造拉丁族裔的时候，兴许在他们的血液中掺进了兴奋剂，这个民族的快乐从来不需要理由。



● 特立尼达种植园的小火车道上，一位古巴人推着自行车走过。摄影/陈阳

再走过一条街，我们发现了一家酒吧，门口有个小乐队在唱歌，是典型的加勒比旋风。看见我们走过，乐手好奇地停下手里的沙球——中国人应该不是巴拉德罗街面上的熟面孔。同行的朋友中有一位是接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无法抵御音乐的呼唤，就率先走进了酒吧。话说不通，我们只能傻笑着，各喝各的酒。

突然有人把我们推到了麦克风跟前，我们毫无准备地进入了小合唱的匆匆排练。我们抛出去的第一首歌是《美丽的哈瓦那》。我们唱得很嗨，他们却只是礼貌地微笑着，神情茫然。过了一会儿我们终于意识到：这首歌是土生土长的国货，没吸吮过加勒比的营养。于是我们又抛出了一首《鸽子》——那是地道的古巴民歌。“当我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可是我们并未在他们脸上呼唤出任何悲伤，他们的表情依旧是一片礼貌的茫然。就在我们准备彻底放弃用歌探路的企图时，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假若这首歌依旧没有得到回应，我已决定给旅行社打电话，求证一下他们带我们来的那个国家是否真是古巴。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我们怯怯地唱出了第一句，很快就有了和声，先是一个，后来是一

群，再后来是全体。中文和西班牙文的歌词在按自己的节奏行进，只有唱到副歌时，在那个“英特耐雄纳尔”的节拍上，我们严丝合缝地踩上了彼此的点。人群开始走近，我们围成了一个圆圈，圈子越来越紧，我们开始握手拥抱。对面的一个男人高举着酒瓶，对我们喊了一句话。这是我们抵达古巴以来听到的第一句英文：

“Brother!”他说。

我有些疑惑。在这个每一个有子女录取在哈佛的中国母亲都要写一本育儿心得，每一家略有门脸的中国饭店都在卖百威啤酒的时代里，我们，中国和古巴，还是弟兄吗？

还有，在过去，我们曾经真是弟兄吗？

这个疑问是在后来的一次哈瓦那之旅中凸显出来的，那次我们走进了古巴革命纪念馆。纪念馆气势雄伟，有好几个楼层，里边陈设除了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使用过的旧物，还有大量的历史照片。我在照片里找到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苏维埃农场的康拜因，我甚至发现了胡志明和他的战友们。可是我没有找到毛泽东。我不仅没有找到毛泽东，我甚至没有找到中国的纺织女工或者是在水田里栖息的牛。我身上那点残存的“哈瓦那孩子”的血开始在太阳穴上涌动，我和那位音乐家朋友冲进了纪念馆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坐着三四个工作人员，面对我们所有的“为什么”，他们的回答始终一致：“No English”（“不会说英文”）。他们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和语气都十分平静，我们绝无可能在这堵以不变应万变的铁壁上砸出一丝裂缝。正打算撤退，那位音乐家朋友突然抛出了一个新招：用歌声敲门。我们在古巴的经历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一个真理：语言走不通的路，歌声兴许能。

这一次，他唱的歌我完全陌生。

我们朝着一个理想进军

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为了和平为了繁荣也为了自由

我们一起斗争……

后来他告诉我，这首歌的名字叫《7.26颂歌》。7月26日是古巴革命纪念日。他比我年长几岁，多学过几首歌。

办公室的人都愣住了。他们大概从未听过一个外国人用一种他们完全不熟悉的语言，如此准确而富有激情地演绎完了这样一首属于他们的年代歌曲，直至最后一个节拍。四周一片寂静，只剩下他的声音在大楼的砖缝里钻来钻去，擦出嘤嘤嗡嗡的回声。

歌很长，他唱完了，很久很久，墙壁都还在震颤。

四周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这才发觉门外的走廊和大厅里，到处围满了人。

“我们这么大的时候，就支持古巴……”我的歌唱家朋友指了指膝盖的位置，语无伦次地说，英文被激动撕扯成一床烂棉絮。“可是你们，怎么，怎么可以……”

一位中年妇女从办公桌前站起来，紧紧拥抱我们的歌手。

“我们一定跟馆长转达你的意见”，她说。

她忘了，十分钟前她还不会说英文。

回到车上，我们依旧还没有平静下来，我们开始热烈地讨论起古巴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我们质疑一切是否真有必要——独立之必要，革命之必要，坚持之必要，或者说，妥协之必要。

其实这场争论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它只不过是四年前另一场争论的延续而已。

那次我们去的地方叫圣卢西亚（Santa　Lucia),在“鳄鱼”的上腹部。我们跟着旅游车去附近的卡马圭古城（Camaguey）游览，沿途的景致相对单一，都是些一马平川的绿色农田和偶尔出现的旧农舍。“不要被那些绿油油的颜色忽悠”，导游告诉我们：“那都是毒草。只要地里长着这种植物，其他作物就别想存活。它们蔓延的速度极快，而且不能根除。唯一摆脱它们的方法就是烧荒，要连续烧上三季，之后才可以种植一些生长力旺盛的植物。”

“这里曾经是肥沃的甘蔗林”，导游说:“这里出产的蔗糖，曾经源源不断地送到莫斯科、布达佩斯、布拉格等地，换来石油粮米和日用品。随着东欧的解体，大部分的糖厂关闭，蔗林便沦为荒芜之地。”

我的心抽得很紧。我心疼，却不完全是为古巴。在这个自然资源如此稀缺的世界上，竟然有千万顷田园如此荒芜着，等待着一把烧山的烈火。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带着这把火进来的，会是美国的百强企业？中国的煤老板？抑或是阿拉伯的石油大亨？

古巴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曾几时，那条“鳄鱼”还是一块被西班牙、英国、美国同时垂涎的肥肉？曾几时，作为美洲第三大都市的哈瓦那，带给过世界怎样纸醉金迷的夜生活？

假如1492年哥伦布未曾发现这条横卧在加勒比海的“鳄鱼”，今天的古巴该会如何？假如1763年英国不曾把短暂获取的古巴主权归还给西班牙，今天的古巴将会如何？假如1896年美国成功地从西班牙手里购买了古巴，今天的古巴又会如何？古巴可以隶属西班牙，可是它不肯。古巴可以隶属英国，可是它没有。古巴有一千个理由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它

依旧没有。

原因很简单：这块鳄鱼形的土地上除了甘蔗，也盛产硬汉。硬汉不想仰人鼻息，硬汉想自己做自己的主。可惜硬汉的力量不够。难倒硬汉的不是勇气，而是物资，所以硬汉不得不求人。硬汉搬了美国来打西班牙，西班牙人走了，美国人却不肯走，硬汉只好搬来苏联赶美国。于是，古巴就陷入了这样一个用依赖来实现独立的怪圈。

我们是在哈瓦那逗留期间听到古巴和美国复交的新闻的。古巴人终于可以过上好一些的日子了，街上那些空空如也的商店里，不久将会被美国黄油和高露洁牙膏填满。可是我却兴奋不起来。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怪圈的终结，还是另一个怪圈的开始。



●在哈瓦那大教堂广场，一位流浪艺人正拿着大提琴走过。摄影/**JEAN-MICHEL VOGE-DragonImage**



• 在古巴圣地亚哥，无数音乐家们习惯到这个小书馆儿聚会。摄影/JEAN-MICHEL VOGE-DragonImage

人：遭遇资本来袭的革命后裔

在古巴街头你经常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人群在排队，有的能看得出所以然，比如排在副食店前的队，大概是在等候凭票供应的新鲜食品。而排在公园门口的，大多是为了一客冰淇淋。排在银行门前的，极有可能是在等着换取可兑换比索——我们自己就排过这样的队。在排队的过程里我们也学会了当地排队的规矩：你需要在人群中找到队尾的那个人。只要得到了那人的认可，你在队伍里的合法性就不会遭受任何质疑。

古巴的货币制度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极为相似，都是双轨制，当地人使用当地比索，而外国人则使用类似于我们当年的外汇劵的可兑换比索。这两者之间的汇率差别巨大，后者大约是前者的25倍。可兑换比索的好处不仅仅在差价上，它还能买到当地比索买不到的紧俏物品。所以，银行门前似乎总是排着长队。

偶尔也会有让你猜不出缘由的队列，比方说那天在哈瓦那街头。那支队伍很长，绕着街角转了几个来回。排队的人手里没提篮子和塑料口袋，看不出与购物有明显的关联。我们问了好几个人，才终于明白这些人原来是在等周五的芭蕾舞票，而那天是周日。对一个据说人均月收入只有十来美元的国家来说，这样的队列让人心生敬意。

那天我们是想去哈瓦那大学的——我们对古巴的校园生活充满了好奇。另外，我们也想找一个能上网的地方。古巴的网络只对外国人开放，费用昂贵，且网速极慢，即使在五星级宾馆也很难查询网络信息，我们在古巴的日子里几乎与世隔绝。

在这之前我们去过几家学校，在巴拉德罗，在卡马圭，在哈瓦那，

有中小学，也有幼儿园。古巴的涉外政策与当年的中国有相似之处却又不尽然相同：当地人被禁止进入涉外宾馆，而外国人却可以自由出入除了军事基地之外的几乎任何地方，包括黑黢黢空荡荡的食品商店和接近于贫民窟的老街区，卡斯特罗似乎不怕掀起裤子让你看屁股上的疖子。

我们没有遭到任何拦阻，堂而皇之地闯入了几家学校。校舍大多简陋却很干净，漆成海洋色调的墙壁上，画着各样色彩浓烈的宣传画。教室里的设施很简陋，在一家临街的幼儿园里，我们看见了一台用纸箱子糊成的电脑，黑笔勾勒出来的屏幕和键盘看上去有些潦草。可是孩子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贫穷，他们见到客人老远就主动招呼，神情活泼而纯真，并无经过洗脑教育的儿童脸上特有的刻板和麻木。不知这些从未触碰过真实电脑的孩子们长到大学年龄时，会不会也成为“拇指一族”？

带着这样的好奇，我们走进了哈瓦那大学。校园在山坡上，要走过很多级台阶。那是一座殿堂式的建筑，大门前耸立着几根极有气势的罗马廊柱，台阶和墙面上长满了黑色的寿斑，却依旧看得出曾经的辉煌。正值周末，校园出奇地安静，我们绕着庭院走了几圈，才遇上了两个学生，一男一女，像是恋人。他们看见我们，便热情地走过来打招呼——这是我们第一次遇上主动和我们说英文的人。

他们是历史系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古巴现当代历史。我问他们毕业后想做什么？女生英文水平有限，只是微笑不语。男生思索了片刻，才说他想教书，也想写书，他要告诉大家古巴这些年发生的事，全世界不能只有美国一个声音。

他的肤色白净——那是几代欧洲血液在加勒比基因中的沉淀——衣着得体，英文几乎听不出口音。他让我想起了30年前的自己。那时的我大概也说过诸如此类的豪言壮语，青春和理想相遇是一种赏心悦目的合宜。

假若我就在那一刻离开，我或许可以保持对哈瓦那大学近乎完美的记忆，可是我偏偏决定滞留，于是我亲手毁灭了一桩虽然很小却依旧难得的满足。

当我们走到数学楼前时，我们遇到了另外两个学生。他们见到我们，也主动走过来，热切地操练起英文。他们是数学系的学生，辅修历史。什么年代的历史？当然是古巴现当代历史。



• 古巴特立尼达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市图书馆。摄影/**Bruno Morandi-DrgaonImage**



• 在古巴，一切个人电子产品都是奢侈。幼儿园的小朋友把纸画的电脑作为玩具。摄影/张翎

哈瓦那大学还有没有别的历史课程？我暗想。

我问他们业余时间做些什么？篮球还是游泳？我特别挑出这两项运动，是因为它们都不需要太大的花费。他俩的回答却让我惊讶：他们喜欢收集世界各地的货币。“能让我看一眼加拿大纸币吗？”其中的一位小伙子怯怯地问。

我毫不犹豫地取出了我的钱包，抽出一张印着伊丽莎白女王头像的

20元纸币——是塑料纸的新版。他们对着阳光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番，然后还给了我。

他们热情地带领我们参观了校园里的几座雕像和纪念碑，甚至一辆古巴革命中使用过的坦克车。我们的谈话围绕着校园生活渐渐铺展开来。我问他们学费昂贵吗？他们说是政府负担。那伙食费呢？也是政府。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大学年代，那时国家为我们支付学费，我每个月还能拿35元补助。

“只是，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很少，吃到肉”，他们彼此对望了一眼，犹犹豫豫地说。这是两个还在长身体的孩子啊。我的心里生出隐约一丝疼意。

“告诉我哪里可以买到肉，我有可兑换比索，我可以给你们买火腿香肠”，这句话没经过脑子，直接从我的喉咙溜出了舌尖。

“其实，假若你愿意，你可以给钱，我们自己去买”，一个小伙子结结巴巴地说。

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打开钱包，抽出了那张被他们仔细研究过的纸钞。

“假如你愿意，你还可以多给几张”，另一个小伙子扫了一眼我的钱包。

我突然意识到，在我第一次打开钱包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看清了里边的存货。我闻到空气里有一些东西在慢慢变味。“不，我们自己也要用”，先生果断地合上我的钱包，拉着我就往山下走去。我听见了身后“咔嚓咔嚓”的脚步声，是他们追上来了。

我们怎么跑得过他们？喊也没用，校园里没人。我近乎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我睁开眼睛时，他们已经挡在了我们跟前，高大，黝黑，威猛。

“我们也有一样东西送你，是切·格瓦拉任古巴银行行长时发行的纸币，上面有他的签名，市面上不多见的”，他们说。

下山的路上，我捏着那张印有切·格瓦拉签名的等值于40美分的10比索纸币，默不作声。我突然开始怀疑周遭的一切：那些墙面上的黑斑，那寥寥几个在校园里时隐时现的人影。也许，我在这里看见的一切都不是偶然，它们都是某项精心策划的计划中的一个部分。

“兴许他们，真的是饿……”先生试图安慰我。

我们坐上了出租车，司机对我们的指令心不在焉，他的目光好奇地落在我们拿来作地图用的手机上。这样的目光我们很熟悉。两天前，我们的一位朋友在哈瓦那街上拍照时，身后走过来两个年轻人，顺手将她

手中的Iphone“抢”走。我在“抢”字上加了引号，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这个字是否使用得当，因为当我的朋友跑过去和他们交涉时，她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们立刻把手机还给了她，顺便送给她一个几乎有些羞涩的微笑。整个事件的实质因此变得扑朔迷离，我们到现在也无法断定它到底是一个带着小小恶意的玩笑，还是一桩藏着些许幽默的抢劫。



● 在哈瓦那海明威故居前，一位海明威的粉丝在模仿他。
摄影/**JEAN-MICHEL VOGE-DragonImage**



● 美国和古巴关系“破冰”之后，古巴街头的出租车也挂上了古巴和美国两国国旗。
摄影/**Catalina Martin-Chico/Cosmos/DragonImage**

而早在五年前，我们的第一次古巴之旅中，我们就有过一次与Iphone相关的奇遇。在巴拉德罗的一个酒吧里我们碰到了一位穿着和化妆都很大胆的中年女子。据她说她在多伦多市区开着一家高档的意大利

餐厅，一年工作358天，剩下的那个星期到古巴度假，年年如此。

那是个早晨，酒吧刚开门不久，她的桌子上却已经堆了四五个空啤酒瓶。她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只Iphone——那时的版本大概还是3，对我们扬了一扬，说古巴真是个好地方，一部破手机,就可以让我过上奇妙无比的七天。她说“奇妙无比”这个词的时候，眉毛朝后挑了一挑，我们这才注意到了她身后坐着一个古巴小伙子。小伙子大概刚从海里游泳回来，棕黑色的肌肤上闪耀着一颗颗晶莹的水珠。他听不懂英文，只是对我们腼腆地微笑着。女人喝完了第6瓶或许是第7瓶啤酒时，便起身离开了酒吧，带着她的Iphone。小伙子尾随着她，两人一前一后地走进了一个房间。我远远看见窗帘轻轻一抖，阳光给挡在了外边。

“这是最新版本的Iphone6 Plus吧？”司机问我们。

“还要跟你说多少遍，我们要去美术馆？”我把手机“咚”的一声扔回了手提包。

我被自己的语气吃了一惊，立刻感到了羞愧。我知道我的火气跟这个满头是汗的中年人毫无关联，他只不过是在一个错误的时刻把车停在了哈瓦那大学门前而已。

太阳已正正地升到了头顶，阳光把一切景致洗刷成一片煞白，街道便再也无法藏匿它的痂疮和皱纹。我对一切突然失去了兴致。

“不去美术馆了，去El Floridita吃饭吧”，我临时改变了主意。

El Floridita是海明威当年常去的一家餐馆。古巴街角的每一家餐馆，都可能钉着一个“海明威曾在此就餐”的铭牌；每一份酒水单上，都可能注明“这是海明威爱喝的酒”。海明威住过的旅馆和农场，早已被开辟成纪念馆，而且还保持着他离开时的大致模样。全世界都知道海明威的巴黎和海明威的西班牙，而海明威生活过将近30年的古巴，却是海明威神话里缺失的一页。

“美国到底怎样，看看海明威的下场就知道。”据说卡斯特罗说过这样的话。的确，海明威在古巴写下了一生的巅峰之作《老人与海》和《丧钟为谁而鸣》，而就在他被外交部强劝回美国的第二年，他在爱达荷州的家中持枪自杀。海明威的价值，大概是这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和古巴唯一达成的一桩共识，也是我这三趟古巴之行中唯一了解清楚了的事实。其余都还是乱线团，需要我在未来的日子里慢慢整理出头绪。

“对不起，天太热了”，我对司机说，算是我的道歉。

“你们的革命广场上为什么只有切·格瓦拉和何塞·马蒂的画像，而没有卡斯特罗？”先生问。

司机沉吟了片刻，才说：“夸奖死人，远比夸活人安全。”

我们忍不住大笑。

2015.8.17.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走出历史的古巴

为什么我们今日依然要谈论古巴？像谈论20世纪70年代怀旧而来的老爷车，一支昂贵的雪茄，一曲动听的爵士乐，一顿精致的加勒比大餐，又或者像谈论老挝、朝鲜和“社会主义”——这一昔日体格庞大、今日不死而正在凋零的老兵？时下，最时髦的怀旧复古风，不在伦敦，不在越南，甚至不在上海和巴黎，新的阵地在古巴。

撰文/刘荣　吴如加



• 在古巴莫罗城堡前，挂有古巴和美国旗帜的帆船正从城堡的灯塔前经过。供图/东方IC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一家知名民意调查机构发起一场全国性调查，选出了最能描述中南美人的词汇如下：“皮肤黝黑”、“脾气急躁”、“充满激情”、“笃信宗教”、“懒惰”、“迟钝”和“拉丁情人”。而如果将这个描述的对象具体到古巴，恐怕还要被美国人加上“偷渡”、“动荡”、“社会主义”和“落后”。

基于美国对古巴的政治和经济封锁，关于古巴的词汇，长期未能得到更新。直到2015年7月22日，这对宿敌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敌对关系，近百年来持续长久的地缘政治对峙从此谢幕。

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革命样本，古巴是一个成功对抗过西班牙、美国、前苏联三个大国的国家。身处社会主义阵营的古巴，从昔日的革命兄弟，到今日的旅游目的地国，古巴有足够的理由引起我们的关注。而一个置身于势不可挡的变革前夜的古巴，更是让人对它的未来充满无限想象。

拉美血统：穿越历史迷雾

如果没有被封锁的历史，美洲最好的沙滩度假城市，不会是墨西哥

坎昆，很可能在圣地亚哥。

古巴漫长的海岸线边，散落着类似圣地亚哥这样大大小小的天然良港。从殖民时代开始，这些港口就成为殖民者的前哨，曾经是西班牙殖民者向美洲大陆贩奴的重要中转站。印第安人、黑人、华人，都在殖民时代抵达古巴。后来，在此基础上，繁荣了古巴持续数百年的种植园经济。

古巴这一名词与海上飓风相关。早在南美热带雨林深处的征战部族反复骚扰这片大地之前，古巴就是一个经常被飓风袭击的海岛。海洋带来的苦难记忆深入古巴的骨髓。因此，抗争也成为一种传统——古巴国徽盾面背后是一根束棒，象征权威；束棒之上是一顶“自由之帽”，表示争取自由、为自由而斗争。

1492年，哥伦布在“地理大发现”时发现了加勒比诸岛中的古巴。它在加勒比的战略位置引起外界的瞩目。1514年，跟随哥伦布到达古巴的西班牙人迭戈·贝拉斯克斯在帕拉达斯河口建立了圣地亚哥城。到了19世纪，完全殖民地化的古巴成为西班牙帝国的“安地列斯珍珠”。

起初，西班牙人抱着寻找黄金的想法，在此屠杀土著。后来西班牙人清楚地意识到在古巴的殖民事业不能单靠开采矿石资源，于是将重点转向了种植业，在海外大肆引入黑人和华人劳工。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殖民和融合，这一举措甚至改变了古巴的血统。除了西班牙裔的半岛人（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通婚），黑人也成为古巴民族重要的构成主体之一。今天的古巴，白人占64.1%，黑人占9.3%，混血人种占26.6% (主要为黑白混血)。

由于地域和气候的差异，古巴人在人种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从人种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全新的年轻种族：身材高大、匀称、健壮、能歌善舞。西部地区以哈瓦那为代表的人更加内敛和温文尔雅，人种构成也十分多元，包括西班牙人、印第安人、黑人和华人。而生活在炎热地区的东部人以圣地亚哥为代表，更具有南美的原生特质，继承了加勒比人粗犷、勇敢、尚武和不屈的性格，著名的古巴朗姆酒和雪茄都出自这些地区，这里自古也是英雄和革命者的摇篮。

圣地亚哥作为西班牙在古巴最早的殖民城市和外港之一，也是古巴独立的英雄城。19世纪的3次古巴独立战争都是从这里开始。此处流传着塞斯佩德斯、何塞·马蒂和卡斯特罗等古巴英雄的轶事。而他们，分别有着黑人、西班牙人的血统；至于古巴的另一位英雄切·格瓦拉，则直接来自南美的阿根廷。

• 古巴地图。绘图/吕寅

• 古巴传奇音乐人康贝·赛甘多（**Compay Segundo**）生前与老朋友埃斯泰罗·伊格莱西亚斯（**Estrello Iglesias**）在乌普曼雪茄厂（**H. Upman**）。摄影/**Pierre de Vallombreuse-DragonImage**



● 在比尼亚莱斯山谷里烟农正在烟田里劳作。摄影/Bruno Morandi-DrgaonImage

古美关系：砒霜或蜜糖

地缘和经济决定了古巴和美国长达百年的“分分合合”，海明威是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例子。

1928年，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记者海明威第一次在古巴上岸，过着狩猎、捕鱼和斗牛的生活，并有了两个儿子。那时，古巴政府完全被美国扶持，也是美国和古巴的第一个蜜月期，这个美国式硬汉写了一部《老人与海》，这是他所有作品中唯一一部完全基于古巴历史、古巴生活、古巴性情的古巴之作。

小说中的老人，不仅仅是硬汉海明威自己的写照，更是古巴式硬汉的性情的真实呈现。从海明威生活中离不开的古巴烈酒和古巴雪茄，以及他身体力行的古巴式生存中，都不难想象，他从内心发现自己找到了第二故乡。

“二战”后，他重返古巴。离去的1958年，正值古巴独立革命发生的前夜。那时，整个美国都在从古巴黯然撤退。回到美国不久后，他在爱荷华的家中开枪自杀。

美国与古巴的关系曾经十分亲密。1898年，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国人就把古巴从西班牙帝国的控制下解放了出来；而此前，古巴人为此战斗了30年。在美西战争中，古巴反抗军与美国人曾经有过合作，那个风靡全球的励志故事《把信送给加西亚》，就是源于此次战争。

西班牙人走了，美国人来了。他们热衷于把在本国行之有效的一套民主程序移植到这个热带岛国。此外，还有财大气粗的美国公司，在许

多古巴人眼中，这不过是另一种殖民。尽管这个短暂的共和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政治腐败以及美国的频频干涉和经济垄断让古巴人愈发感到难以忍受。

古巴人会说，哈瓦那一直停留在海明威离开时的样子。他住过的哈瓦那旧区，1982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时光像按下了中止键，那些建筑和生活场景保留了下来。行走在这个时光停滞的地方，从西班牙式样到法国新古典主义风格，从意大利风格到英国特色，从欧洲新古典趣味到古巴当地流行的高顶窄门，俨然一座欧洲建筑的博物馆。

而研究者和旅行者都需要直面一个现实——这些遗产的保存，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美国和古巴将近60年的“关系密切时期”，今天哈瓦那85%的建筑，都是在那一时期建造或者修复起来的。

在美国帮助下的“舶来品”，还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企业文化和社会建构。古巴的单一种植经济结构在这一时间被打破，一个新的旅游业正蓬勃发展起来，成千上万的北美人来到古巴，定居哈瓦那，建造乡村俱乐部、游艇俱乐部等，与古巴的上流社会和外籍精英打成一片。美国黑帮甚至也渗入了古巴，建立起了性产业。

年轻的古巴人争先恐后地接受美国文化，从各类产品到体育、棒球，从艺术到文化，从建筑到绘画，英语词汇已经和西班牙语相互融合，好莱坞的电影和乡村音乐也在古巴年轻人中流行。

20世纪50年代，美国是古巴糖最大的出口市场，古巴进口商品的76%来自美国，90%的电信、电力设施和服务都由美国公司提供。北美式消费文化风行古巴。古巴富人买美国车——这些上世纪早期出厂的老爷车至今仍留在哈瓦那的大街上，他们还热衷于去纽约和迈阿密购物。中等收入的古巴人也在努力工作，以拥有美国消费品作为良好生活的证明。

古巴独立运动后，古美关系急速恶化。效率低下的计划经济，西方经济禁运带来的经济倒退，使得在海明威的哈瓦那，美丽的建筑也失去了维修的动力。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旅行者会发现：半个世纪以来，哈瓦那每年有150座殖民时期的建筑倒塌；在哈瓦那中心区和老城区，有历史价值的欧式漂亮楼房在热带潮湿空气和飓风暴雨中接连倒下。这些建筑的主人们，其中有不少人，很可能是在革命前期逃亡美国，也可能已经作为卡斯特罗政府的反对者而被处决。至于冷战时期，古巴和前苏联亲善期建立起的苏俄式高楼——它们多半有十层左右、钢筋水泥结构，30年楼龄不满，已经彻底地毁坏。

然而现实却是，亲美的巴蒂斯塔政府治下，恰是独立后古巴最为腐败和黑暗的一段时光。而依附型经济则让古巴在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遭受重创。这便是为何卡斯特罗想再造一个新美洲，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不论政治、经济，都摆脱对外国的依赖。



• 圣地亚哥的殖民地风格街头风景和老爷车。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 圣地亚哥是聆听非洲风味古巴音乐、观赏伦巴舞的天堂。摄影/**Bruno Morandi-DrgaonImage**

社会主义阵营的“黑马”

革命的古巴像一个时光标本，浓缩了这个星球上人类群体的欲望、野心、苦难和挣扎。寻求民族独立的古巴，起先并未在“姓社还是姓资”的意识形态阵营中站队，它想要的只是“活下来，有尊严”。

“当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带着军队进入哈瓦那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政权会走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全然不知。”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切·格瓦拉是个共产主义者，这没有人怀疑；但卡斯特罗本人则告诉美国记者，他所领导的“七·二六运动”从来没有实行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打算。甚至在革命胜利之后，尽管实行了一系列国有化政策，古巴的领导人仍然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直到1961年春天的“猪湾事件”之后，卡斯特罗才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正式宣布古巴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看起来这似乎是古巴在情急之下的“左转”，但卡斯特罗本人对此并不承认，他宣称自己“早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了”。

古巴独立革命为何最终变成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古巴人会无奈地告诉你，革命，既可能是噩梦和破坏，又可能仅仅是生存之道。

“猪湾事件”之后，古巴无可选择地投向了苏联的怀抱。有了苏联的支持，古巴站在对抗西方阵营的最前线，显得信心十足。

1962年，苏联开始在古巴部署自己的导弹，但是很快，美国侦察机拍摄到了导弹发射架。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被称为“古巴导弹危机”。这是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国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危机虽然仅仅持续了13天，美苏双方在核弹按钮旁徘徊，最后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该事件至今被认为是人类存亡的最危险时刻，热核战争几乎就要发生。对此，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也持一致看法。而风暴中心的古巴，是生是死，则根本不在大国的考虑范围之内。

此时古巴全国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格瓦拉正在他的野战指挥部里等待着美国人的入侵。只是古巴人没有想到，赫鲁晓夫在没有和他们商量的情况下与美国人做了交易。卡斯特罗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怒不可遏，不停地咒骂赫鲁晓夫出卖了古巴。

尽管如此，古巴人心里清楚，苏联可以给予古巴的，远不止于导弹。在与美国彻底切割之后，古巴依旧没有发展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与革命之前相比，依赖的对象从美国变成了前苏联。

为了保卫这盏“加勒比社会主义明灯”，前苏联连续几十年给予其大规模军援和经济援助，古巴境内长期保留大量前苏联军人和基地。

过度依赖的结果是，1991年前苏联解体后，古巴85%的出口市场瞬间消失，支持国民经济的援助和优惠贸易协定灰飞烟灭。3年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不过，为了制衡美国，俄罗斯人保留了离首都哈瓦那不远的卢尔德斯监听站。而美国人则一直以经济援助为要挟，要求关停这个监听站。2001年，换了人间的俄罗斯，由总理普京决定关停监听站，这一决定让

古巴人无法接受。

2013年，为了反制美国和北约的东扩，俄罗斯重新恢复与古巴等拉美国家的外交，开始新一轮“政治联姻”，并免除了90%前苏联时代的古巴债务。2014年，俄罗斯决定重启卢尔德斯监听站。

TIPS

殖民时期的古巴世界文化遗产

截至目前，古巴有7处世界文化遗产，如下：

比尼亚莱斯山谷

在烟草种植业中仍使用传统技术的比尼亚莱斯山谷，199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说起古巴，不得不提它对世界烟草的贡献。因自然、气候条件适宜烟草生长，古巴出产的烟草为世界之最。

特立尼达城和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

特立尼达城和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198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这里保存着75家榨糖厂主的庄园遗址。1547年，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甘蔗在古巴进行种植。

咖啡种植园考古风景区

古巴咖啡种植园考古风景区200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古巴本无咖啡种植，1790年，临近的法国殖民地海地发生奴隶起义，3万多法国殖民者逃难到达古巴定居下来。他们将在海地拥有的丰富咖啡种植经验带到古巴，在古巴东南部地区从事咖啡种植园经济。

哈瓦那旧城及其工事体系

哈瓦那旧城及其工事体系1982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旧城位于哈瓦那湾西侧的一个半岛上，建于1510年，旧城的城堡及其工事体系，是西班牙在美洲建立的用于征服新大陆的重要基地之一。

圣地亚哥的圣佩德罗德拉罗卡堡

圣佩德罗德拉罗卡堡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座城堡设计于1673年，1700年建成，是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复合建筑体，是西班牙殖民时期拉丁美洲军事建筑里保存得最完整的一个。

西恩富戈斯古城

西恩富戈斯的历史中心在2005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西恩富戈斯古城建于1819年4月22日，当时的法国和西班牙殖民者将其打造成在拉丁美洲殖民地中的杰出城市，从建筑到城市建设都让西恩富戈斯成为当时的现代化城市。

卡马圭历史中心

卡马圭历史中心在2008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卡马圭1514年2月2日始建于今努埃维塔斯港所在地，曾名太子港，1528年迁现址。卡马圭也是西班牙人在古巴最早建造的七个村庄之一。

雅尼私人博客：对自由的向往

2006年，生活在哈瓦那的普通女孩雅妮大概还记得，这一年传奇领袖卡斯特罗因为肠胃炎发作，将权力转移给弟弟劳尔。第二年，雅妮在互联网开博。

在古巴革命独立的几十年来，很多古巴人流亡海外。革命初期逃亡的多为富人和知识精英，接下来大规模逃亡的都是普通古巴人。有91万逃亡的古巴人生活在美国，渐渐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在古巴、苏联结盟的30年里，十分之一的古巴人逃亡海外，甚至不惜自制各种渡海工具投向加勒比海，不少人因此葬身。

然而今日，古巴与美国之间无需相互遥望。自1993年卡斯特罗的适度政策调整后，政治改革展开，对宗教互访也放开了限制。古巴重启了和美洲各国的外交关系，潜在的联系正在加强。尽管互联网的使用没有完全开放，但古巴自由意识的觉醒，已从底层开始。

生于1970年代的雅妮就是这样一个觉醒的普通古巴人。她生在苏联“老大哥”对古巴援助的时代。亲睹了1989年到1991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动荡和惨烈。又曾经留学欧洲，专业是历史语言学。2002年她选择回到古巴，说自己想说的话。她的博客自我介绍是——她想帮助“建设一个多元化和包容性，可以给所有人提供空间的古巴”。

在古巴，外籍客人和本国国民都要接受严格的互联网控制，而且费用高昂，雅妮早期必须要假扮外国游客，进入外国人聚集的收费网吧，通过电邮形式发给自己国外的朋友。

雅妮的博客不用“独裁”或“体制”这种词，回避最高领导人的名字，她如实地呈现古巴的细微变化，消解着“墙”外对古巴的过分夸大或诋毁。她的微茫之声有如一个小小的镜面，折射出变化中的古巴和南美。古巴新政带来的新气象，从对非官方的独立意见的宽容开始。

2008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她为当年100位风云人物之一。这一年，联合国大会第十七次通过投票结果，督促美国解除对古巴的禁运。

在1994年开放旅游业后，除了大批游客的引进，古巴的自由市场经济化范围越来越大，2011年，古巴人终于可以自由买卖房屋和汽车等私人财产，也鼓励市场经济主体的多样化，比如旅游业面向私人餐饮和酒店开放，外资农场和私人合作社也出现在古巴。

今日的旅行者，在古巴街头感觉到的细节更多：喜欢收集车辆的，会发现在长期禁运和物资短缺下，古巴人自给自足，改装制造的能力极强，除了发动机，几乎什么配件都能制造出来，因此四五十年的老爷车也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

2015月7月22日，古巴和美国宣布建交。这一迹象曾在2014年年末流露过。今日，不管是在哈瓦那还是在圣地亚哥，对美国的反对宣传标语都已经摘掉了，只是在古巴消费，对欧元的态度比对美元的态度显然还是更为宽容，体现在换汇过程中美元要收取高额的手续费上。

民间的互访和移民已将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根据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缩写CBP）的服务，从2014年1月到2015年9月，到美国的古巴人比1994年移民危机时的人还多。总共有36497名古巴人，这个数据代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0%。

一个包裹在血色琥珀里的国家，已经嗅到了开放的空气。

古巴的历史

殖民统治时期

◎ 1492 年，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美洲时发现古巴岛。
◎ 1511 年，西班牙征服者远征古巴，古巴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
◎ 16 世纪，征服者从非洲大量输入黑奴，从事种植园劳动。

独立运动时期

◎ 19 世纪初，古巴人民掀起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
◎ 1867 年，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古巴开始要求独立的十年战争。
◎ 1897 年 11 月，西班牙被迫同意古巴自治。

美国占领时期

◎ 1898 年 12 月 10 日，美西签订《巴黎和约》，西班牙把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同时放弃在古巴的一切权利。
◎ 1901 年，在美国军事当局的监督下，古巴召开制宪会议，制定宪法。
◎ 1906 年，古巴爆发反埃斯特拉达·帕尔马政府起义，美国趁机对古巴实行第二次军事占领，建立军政府，直接控制古巴达 3 年之久。
◎ 1933 年 8 月，爆发的反美、反独裁斗争，推翻了马查多·伊·莫拉莱斯政权。
◎ 1952 年 3 月，巴蒂斯塔在美国支持下第二次上台执政。

革命胜利时期

◎ 1959 年 1 月 1 日，起义军进入哈瓦那，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同年 1 月 2 日，宣布成立革命政府，马鲁蒂亚任总统，2 月卡斯特罗出任总理，7 月多尔蒂科斯出任总统。
◎ 1961 年 4 月，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 1976 年，举行公民投票，通过宪法，同年 12 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取消总统制，设立国务委员会。

哈瓦那：冻结在胶囊里的时光

这是一座时间慢流的城市，老爷车、革命的激情、慢悠悠的生活，让人恍然间回到了那段冻结在胶囊里的旧时光。它有殖民时代的印痕，它有革命时期的冒险，它也有摩登时代的时尚……它，就是哈瓦那。

撰文/顾剑



●哈瓦那港口，远处是莫罗城堡。摄影/**JOSE GOITIA-Dragon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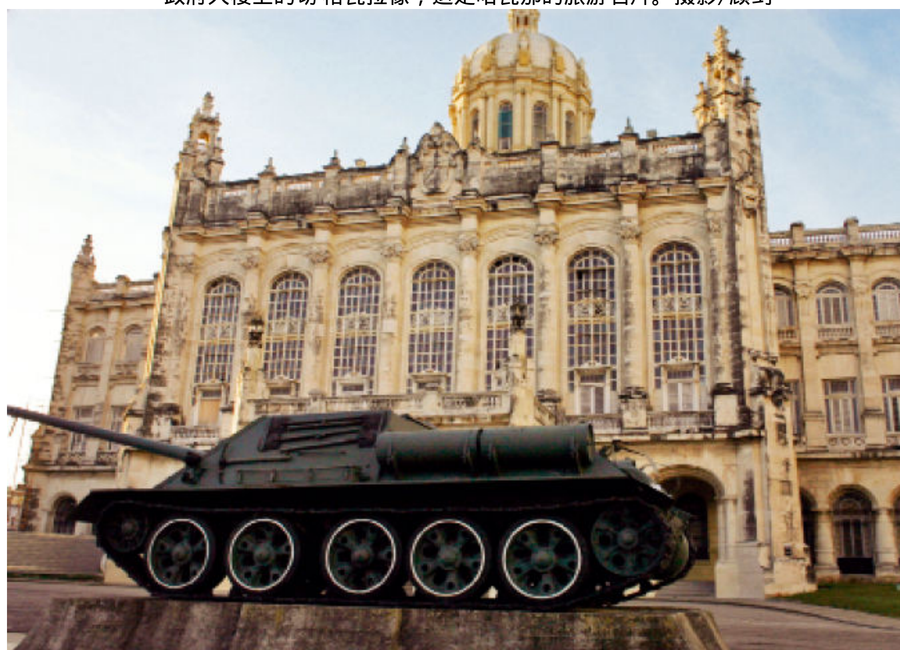
我到古巴的第一站是哈瓦那。

一出机场海关，扑面而来的除了潮湿温暖的空气，还有“70年代”的感觉。机场的设施有些陈旧，宽大的旧式座椅，老式的航班到达显示屏，还有一拥而上的当地人，争相问你需不需要换钱或者乘坐出租车。

好不容易挤出人群，我乘车前往林肯旅馆。它位于市中心靠近海边的位置，是一栋独立的9层大楼。略显破旧的国营旅馆，在历史上却赫赫有名。上世纪50年代，这里是哈瓦那数一数二的高级旅馆。1958年，古巴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期间，林肯旅馆还曾接待过著名阿根廷赛车手卡洛斯·方吉奥，他是早于舒马赫的“五连冠”传奇人物。更奇特的是，方吉奥还在这里被革命党绑架，这近乎盗侠罗宾汉的行为，竟令被绑者很是欣赏。我在旅馆5楼看到了方吉奥曾经住过的房间，墙上挂着他的照片。不知道他20年后与绑架者卡斯特罗“相逢一笑泯恩仇”时，是否还怀念过这里，以及这座城市。而我在哈瓦那的旅行，却经由这奇特的故事拉开了序幕。



• 政府大楼上的切·格瓦拉像，这是哈瓦那的旅游名片。摄影/顾剑



• 哈瓦那革命博物馆前的苏联坦克。供图/东方IC



● 哈瓦那革命博物馆大厅，也即哈瓦那前总统府。摄影/顾剑

悠然老时光：殖民时代的蓝调

哈瓦那城市的北面和东面都是大海，但风景最美的地方是位于东北角的哈瓦那城堡和港口。热带阳光下的加勒比海，蓝得很通透，港湾里停泊着几只小木船，也被刷成明亮的天蓝色，随着雪白的浪花一漾一漾，让人觉得悠闲又舒适。浪花徐徐推进，一波又一波，拍碎在城市北海岸沿海大道外的防波堤上。远处的山顶是高耸的莫罗城堡，在拱卫海港入口。

1898年，这平静的哈瓦那港却发生了一件极不平静的事。2月15日，当美国海军战列舰“缅因号”在那里抛锚时，突然发生了爆炸，巨大的声响，冲天的火光，震动了整个哈瓦那港。很快，军舰沉没，258名美国水兵因此客死异乡。当时美国跟古巴的殖民地宗主国西班牙关系紧张，尽管20世纪70年代在分析、梳理证据之后确认“缅因号”爆炸只是一个意外，但在1898年，这次爆炸成为美国向西班牙宣战的导火索。

美国对待“缅因号”灾难的态度，夹杂着恐惧、自豪和复仇的激情。一位名叫约翰·布莱克·阿尔金斯的记者1898年4月来到美国曼哈顿，他在《曼彻斯特保卫者》中描绘了美国公众对于这场即将爆发的美西战争的期待：

美国国旗在所有的街道和窗户上悬挂着。好战的观点和战争简报贴在商店的窗户上。街上行走的男男女女和他们的狗带着美国的徽章或者“支持”字样。自行车装饰着国旗的颜色好像要进行一次奇特的服装展示游行。人们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口号“记住缅因号！”

美西战争以美国大获全胜结束。美国夺取了西班牙在海外的两个重要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美国国旗在哈瓦那飘扬，西班牙总督被美国将军伍德取代。在哈瓦那城堡这片地区，曾经的西班牙总督府，也是后来的美国总督府、首个古巴总统府，如今被辟成博物馆，留待人们参观或怀念。不过，我对参观总督府兴趣索然，注意力却还是被那个日常的哈瓦那所吸引。

古巴或许经济欠发达，但是在海边晒太阳、野餐的人们、在海滩上嬉闹的孩子、在防波堤上垂钓的老翁，都给人安贫乐道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热带气候的关系，就算在哈瓦那这样大都市的海边，人们走路的节奏也是缓慢的，仿佛从几百年前的殖民时代就是如此，也许还会一直像这样慢下去。我也坐在防波堤边发呆，想起木心那首小诗里的几句：“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有些老城，只是保留一个空壳，为游客展示过去的生活，像是一个博物馆，比如卡塔尔的多哈、阿塞拜疆的巴库。但哈瓦那不是这样，人们居住在旧城那些狭窄的街道中，而殖民时代堂皇宏伟的旧建筑里仍然住着

七十二家房客。街巷窄窄的，经常能看到当地人在银行和粮店门外大排长龙。尤其是粮店，往往只有一家门脸，屋子里是柜台，柜台后则堆着面粉之类大包装的食品，墙面货架上疏疏落落地摆放一些面包或蛋糕的制成品。我不由想起小时候凭粮票排队买米买面的日子来。

街道两旁的建筑，以西班牙殖民时期风格为主。建筑外立面精雕细琢，窗户细长，外有铸铁护窗栏杆。因为户外阳光毒辣，屋子阳面的窗户一般都不会打开，这使得突然走进室内的人们通常眼前一黑，要适应好一会儿。不过，这些旧房子的现状都令人揪心，一方面毕竟国家经济困难，政府没有钱来维护这么多普通楼房，另一方面，古巴又没有私企能承担这项社会责任，这些老楼便只能任由荒废了。不过，古巴政府也选择性地维护了一些更古老的建筑，诸如旧城中心欧洲巴洛克风格的哈瓦那大教堂，西班牙殖民时期修建，有400多年历史。

在哈瓦那大教堂门前那条街上，有一家酒吧，就连白天也聚集了大群的游客在这儿喝酒。这些人，都是跟着大作家海明威来凑热闹的，当年海明威喜欢在这喝一杯Mojito。我也点了一杯Mojito。按照古巴的物价标准，简直贵得离谱：5外汇券比索一杯。要知道，15比索能在家庭旅馆吃到一顿有三只龙虾的晚餐，20比索在旧城区的高级餐馆能享用一顿可口的西班牙美食。

这个酒吧还兼卖革命纪念品，墙上贴着革命时期的招贴画，印有切·

格瓦拉头像的T恤到处都是。在酒吧门口，有几位满脸皱纹、瘦小干瘪的当地老头老太太，叼着巨大的哈瓦那雪茄，游客特别喜欢与他们合影。或许，这里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哈瓦那：革命的纪念品、抽雪茄的老人、海明威的酒等等。

还有一样，也是哈瓦那或者说是古巴的象征——老爷车。很多人以为，古巴街上到处都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爷车，一派复古的情调。其实不然，古巴的确有很多老爷车，但能跑得动的不多了，哈瓦那大街上缓缓驶过的老爷车，一般都是为了招揽游客兜风赚钱的。但这并不妨碍我找个地方静静怀旧，据说哈瓦那有两个看老爷车的最佳去处，一个是城堡前的广场，另一个是新城与旧城交界的国会大厦门前广场。



• 哈瓦那破败而精致的老建筑。摄影/顾剑



● 近年，咖啡馆这样的小型商户都有着朝向街道的门脸，所有古巴人都微笑着等待一场真正的改革。摄影/JOSE GOITIA-DragonImage



●哈瓦那国会大厦广场前的老爷出租车。摄影/**Bruno Morandi-DrgaonImage**

仍旧是革命的纪念

老城的西南方向是新城区，留有许多与古巴革命相关的遗迹，比如：议会大厦、中央公园、革命博物馆、革命广场、革命纪念碑等等，不胜枚举。

革命博物馆尤为值得一提，这是革命前巴蒂斯塔的总统府。巴蒂斯

塔1902年出生在古巴一个甘蔗种植园里，他声称自己血管里流淌着非洲人、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中国人的血液。作为革命领导者、选举产生的总统、军事独裁者和黑手党中腰缠万贯的卫士，他在古巴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印记，只有1959年的革命才最终将他抹去。在那之前，正是在这座建筑中，曾经发生过刺杀巴蒂斯塔总统的事件。当时，一批刺客已经攻进了总统府，巴蒂斯塔利用暗道逃跑，才躲过一劫。今天富丽堂皇的会客大厅悬挂着巨幅古巴国旗，在内阁会议室外面的楼梯走道里，还能看见那场刺杀枪战留下的弹痕。

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有一个被大玻璃罩保护起来的游艇。不用说，这就是在古巴历史上有名的“格拉玛号”游艇。1956年12月2日，卡斯特罗、格瓦拉等82人乘坐它从墨西哥漂洋过海准备登陆古巴，计划以此来引发一场广泛的、全国范围的暴动，进而推翻独裁者。尽管这最终被当作一次最为英勇的史诗般的行动来歌颂，但无法掩饰这是古巴秘密登陆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次。

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缓慢航行的“格拉玛号”比原计划晚了两天才到，多数游击队志愿军因为晕船而萎靡不振。因为晚到，原本在红滩接应船只到达的卡车被迫撤退了。更糟糕的是，“格拉玛号”即将登陆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在到达后的几个小时里，他们遭到了来自空中和陆地的夹击。历经千难万险，登陆10天后，他们才与国内抵抗组织的成员会合。

虽然有一个不幸的开端，但这件名垂拉丁美洲史的重要事件，还是为卡斯特罗带来了好运。短短3年之后，卡斯特罗赢得了革命的胜利。胜利引发的狂热激情，使得卡斯特罗效法早期西班牙征服者的惯用方式，开始了从圣地亚哥到哈瓦那的漫长的全国巡视。从当年的资料片上可以看到，他有时坐着敞篷吉普，有时在一辆坦克上，频繁地停下来向热情的群众招手示意。

1957年1月8日，卡斯特罗抵达了哈瓦那，穿过狂热而兴奋的人群，进入了哥伦比亚兵营。如今，这座曾经最大的兵营已不复存在，但卡斯特罗那堪称神奇的故事却还被传颂着。他在哥伦比亚兵营演讲，向现场的听众们演说革命团结的必要性。这时，一件被所有亲历者铭记的突发事件—两只白色的鸽子飞过来，停在他的肩膀上。有人说，这是一个意想不到但具有积极意义的象征，标志着古巴历史新时代的开启。

那时的哈瓦那，是一个喜庆、狂欢的城市。据当时在哈瓦那的意大利出版商贾科莫·菲尔特里内利在书中的描述：这里满是西班牙人、黑人和华人，充满着生机和色彩，“你经常会在这里或者那里碰到那些留着大胡子的游击队员。他们全副武装，带着手枪和冲锋枪，懒洋洋地坐在公共建筑前的大椅子上，防备着敌人的袭击。”

在哈瓦那新城内陆腹地，还有一处古巴革命广场，广场中心形似竹节的建筑是国父何塞·马蒂的纪念碑。纪念碑背后正是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卡斯特罗兄弟的办公室就在那里。

中央委员会不开放参观，连远远地拍照也是被禁止的。于是人们转而拍摄内政部大楼上巨幅的切·格瓦拉画像。这幅画像是哈瓦那的旅游名片，经常出现在各种关于古巴的文章和游记里。

内政部大楼旁边是信息部大楼，其上还有另一幅巨像跟切·格瓦拉遥遥相对。乍看之下，我吓了一跳：难道古巴政府这么痛恨美国，居然于此悬挂“9·11”事件元凶本·拉登的巨幅纪念像？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看上去颇像本·拉登的大胡子，是古巴革命中的另一位英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时，他与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一样，被看作这场革命的象征。但革命成功几个月后，他还来不及更充分地描绘自己的壮丽人生，就不幸早早离开了人世。我发现画像角落有一行西班牙语小字：“Vas Bien, Fidel”，这是西恩富戈斯去世前不久和卡斯特罗通电话时留下的一小句名言，翻译过来是—“放心，一切都好，菲德尔”。

从革命广场离开的当天夜里，我又去哈瓦那郊外的演艺厅，看了一场上世纪50年代百老汇式的盛大歌舞秀Tropicana。这场歌舞在革命开始之前就曾经蜚声世界，场面宏大，歌舞和灯光设计均属一流，彼时大概要算是“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生活方式。它被保留到今天，让观者好像突然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纽约百老汇。那种歌舞升平、衣香鬓影，令我恍然不知身在何处。在这个穿越的夜里，在这个时光胶囊一样的城市，时间仿佛倒流，我不由得在心里重复了一句西班牙语：

“Vas Bien”——放心，一切都好。



•哈瓦那大教堂，这是一座西班牙殖民时期的老建筑。摄影/顾剑



●哈瓦那城区的迷人风景。摄影/**Bruno Morandi-DrgaonImage**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CHARMING
SRI LANKA
斯里兰卡
古城之魅

点击阅读

“红色的切”世界偶像制造

切·格瓦拉是古巴的一个传奇、一个偶像、一个符号，作为拉美游击战的英雄、体制的反叛者，他还代表了自由的激情、抵抗的勇气和永不沉沦的精神。那么，他如何成为了“世纪偶像”切·格瓦拉？

撰文/夏榆

1959年，随着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的成功，古巴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菲德尔·卡斯特罗与亲密助手切·格瓦拉同时成为世界瞩目的政治明星。1960年，法国思想家保罗·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娃来到古巴，对这个新兴的革命之地进行考察。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分别接见了他们。格瓦拉的神秘气质给萨特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后在格瓦拉遇难后，萨特给了他极高的赞誉。他称其“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

2010年盛夏，法国著名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来到北京。德布雷身兼多种身份，作家、哲学家、媒介学家、龚古尔文学奖评委。更重要的是，德布雷在青年时期曾参加拉美革命，与格瓦拉共同出没玻利维亚游击战丛林，他是格瓦拉生命最后时刻的见证者。

我应邀赴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中心访问德布雷先生。现场聆听他的演讲，通过他的个人视角回望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的革命风云，回望格瓦拉的人生故事。

1967年4月9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哲学教师雷吉斯·德布雷在玻利维亚米约旁巴镇被政府军逮捕，当年他26岁。被捕时，他正试图保护一支由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安全返回国内，这支游击队在1967年9月到达玻利维亚。在遭受数天的严厉审讯之后，德布雷被秘密关押，玻利维亚政府指控他为游击队领导人之一，他面临被处死或者监禁30年的判决。

2014年9月，德布雷再访中国，讲述格瓦拉的故事，也讲述对世界“革命”的思考。



• 古巴街头随处可见切·格瓦拉的肖像。摄影/JEAN-MICHEL VOGE-DragonImage

1959年，随着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的成功，古巴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菲德尔·卡斯特罗与亲密助手切·格瓦拉同时成为世界瞩目的政治明星。1960年，法国思想家保罗·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娃来到古巴，对这个新兴的革命之地进行考察。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分别接见了他们。格瓦拉的神秘气质给萨特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后在格瓦拉遇难后，萨特给了他极高的赞誉。他称其“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

2010年盛夏，法国著名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来到北京。德布雷身兼多种身份，作家、哲学家、媒介学家、龚古尔文学奖评委。更重要的是，德布雷在青年时期曾参加拉美革命，与格瓦拉共同出没玻利维亚游击战丛林，他是格瓦拉生命最后时刻的见证者。

我应邀赴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中心访问德布雷先生。现场聆听他的演讲，通过他的个人视角回望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的革命风云，回望格瓦拉的人生故事。

1967年4月9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哲学教师雷吉斯·德布雷在玻利维亚米约旁巴镇被政府军逮捕，当年他26岁。被捕时，他正试图保护一支由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安全返回国内，这支游击队在1967年9月到达玻利维亚。在遭受数天的严厉审讯之后，德布雷被秘密关押，玻利维亚政府指控他为游击队领导人之一，他面临被处死或者监禁30年的判决。

2014年9月，德布雷再访中国，讲述格瓦拉的故事，也讲述对世

界“革命”的思考。

切的神话”

“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这是格瓦拉激励人心的格言。

1998年，我开始漂流北京的时候，在动物园服装批发城买到一个印有格瓦拉头像剪影的军绿挎包，后来只要出门就会背着这个挎包，醒目地显示着身上的这个左翼倾向；2000年夏天，我坐在北京人艺剧场观看当年飚红的实验话剧《切·格瓦拉》，体内的血液被剧院回荡的激情、具有“革命”色彩的台词点燃，和无数观众沉浸在由异国抵抗者所唤醒的自我激励中；2006年，朋友到古巴游历，带给我一个在哈瓦那街头买到的印有格瓦拉头像剪影的棕色羊皮笔记本。很长时间书包里随身带着这个笔记本。我想在世界上会有很多年轻人使用印有格瓦拉头像剪影的物品，书包、T恤、钱包、笔记本、钥匙链。格瓦拉的头像成为世界非主流文化符号，如同暗号一样使人们彼此亲近。格瓦拉，作为拉美游击战的英雄、体制的反叛者，他代表自由的激情、抵抗的勇气和永不沉沦的精神。

我的书架上有格瓦拉生前记述的《玻利维亚日记》，日记中记录了他的生平和重要时光。

1928年6月14日，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罗萨利奥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求学期间和毕业不久，他曾多次周游拉丁美洲，其中包括他早年在《摩托日记》中描述的，他在1952年驾驶一辆诺顿牌摩托车所进行的不可思议的北美环球之游。加勒比海的美丽岛国古巴，不仅在地理上更在文化上，为充满拉丁气质的革命青年提供了理想的新天地。著名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的影片《摩托日记》，讲述了格瓦拉的革命理想的形成与青年时代的拉美旅行相关。1954年，格瓦拉客居危地马拉期间开始投身政治活动，然而他支持的民选政府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格瓦拉随即逃亡墨西哥。

早年格瓦拉在危地马拉和流亡的古巴革命者有过初步的接触，随后又在墨西哥城找到了他们。1955年7月他会见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当即加入了旨在推翻古巴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游击队远征军。古巴人给他起了昵称“切”。随后格瓦拉作为游击队一名随队医生登上“格拉玛号”游艇开始驶向古巴，这支游击队随后在古巴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展了革命武装斗争。几个月后，格瓦拉被菲德尔·卡斯特罗任命为第一位起义军少校司令。他同时负责游击队伤病员和巴蒂斯塔政府军伤病俘虏的治疗工作，在随后的革命战争中格瓦拉功勋卓著。



• 已故著名摄影师雷内·布里（**René Burri**）在其最著名的作品《抽雪茄的切·格瓦拉肖像》前留影。摄影/龙海



• **1964**年**12**月，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第**19**次大会。供图/**FOTOE**

格瓦拉一生具有传奇性。1959年，独裁者巴蒂斯塔逃离古巴，格瓦拉成为革命新政府中的一名重要领导人，始任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工业司长，继任国家银行行长，后改任工业部部长。格瓦拉还是后来的古巴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之一。除了担任这些职务以外，格瓦拉还是古巴革命政府在国际事务活动中的出色代表，他频繁出席国际会议，在国际论坛发表演讲，他的慷慨激昂和能言善辩令国际瞩目。美国《时代》周刊曾

经评选格瓦拉为“世纪偶像”。这与他后来领导的“革命”行动有关。1965年4月格瓦拉离开古巴，继续投身游击战争。最初他领导一支由古巴人组成的游击队赴刚果支持刚果人民的革命斗争。1965年12月，他秘密返回古巴，筹建一支由古巴人组成的游击队前往玻利维亚。格瓦拉的计划是挑战该国的军事独裁政权，最后以燎原之势将革命运动推广至整个拉丁美洲。

1977年，法国著名导演克里斯·马盖拍摄纪录片《红底色的年代》，回顾了弥漫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激情。其中有一个历史细节，格瓦拉要在玻利维亚建立游击军事基地，却被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拒绝。既缺乏当地印第安人的支持，又没有可靠的根据地，格瓦拉的革命实践离其目标越来越远，最后被迫沦为一场冒险。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在游击战斗中负伤，他落入接受过美国训练和操纵的玻利维亚反叛乱部队手中。次日惨遭杀害。随后政府军隐匿了他的尸体。他被砍掉了双手，其尸体和几名战友的尸体一起埋在了玻利维亚中部山区小镇巴耶格兰德外的飞机跑道附近。

美国作家乔恩·安德森在其所著的《切·格瓦拉传》中深情地写道：

切的敌人不愿看到他的墓地受到众人的瞻仰，他们希望他的消失能够终结切的神话。然而，切的神话超越了所有人的控制，越传越广。成千上万的人为他的去世哀悼。诗人和哲学家赞美他，音乐家编曲歌颂他，画家描绘他的英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游击战士们高举他的旗帜奔赴战场。在美国和西欧的年轻人奋起反抗越南战争后的既定秩序、种族歧视和社会正统观念的时候，切叛逆的脸庞成为他们的终极偶像。切的遗骨可能消失了，可是他的精神还活着，切无所不在。

“与切在一起”

在格瓦拉遇难43年之后，德布雷讲述了当年他在格瓦拉的玻利维亚游击营地尼阿卡瓦苏的情景。德布雷被捕之前化装成一个墨西哥的新闻记者，他与一个名叫西罗·布斯托斯的阿根廷画家结伴去采访格瓦拉，来到游击队营地。当时有人怀疑他们是特洛伊木马—美国中情局的奸细。因为在他们被捕6个月之后，格瓦拉和他的战友们被捕。

由美国作家乔恩·安德森所著的《切·格瓦拉传记》有两章特写了当时的情景。在传记所附的照片中有一幅是格瓦拉与德布雷、布斯托斯等人在游击队营地的合影。还有一幅照片是格瓦拉阅读德布雷的著作《革命中的革命》的读书笔记中的一页影印。这些照片在格瓦拉与政府军的作战中失而复得，真实记录了当时的现场，成为具有文献价值的物证。

其时是格瓦拉的游击战最艰苦而磨难丛生的时刻。《切·格瓦拉传》描述了当年的情景：

几天前，玻利维亚警察突袭了营地下方的卡拉米亚庄园。切在回营地的路上传来更多坏消息。政府军回到他们的农场，没收了一头骡子和

吉普，抓住了一名正在返回营地的信使。切加紧赶回营地。他回到营地时，发现营地里弥漫着一种失败的情绪。人乱做一团，人心涣散。

德布雷是在那时候见到格瓦拉的。其时他的身份是“一名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和卡斯特罗以及古巴的安全部门关系密切。他积极支持在拉丁美洲推行古巴的革命模式。格瓦拉和德布雷交换了意见，德布雷说他希望留下来参战。可是格瓦拉却说，如果在欧洲开展工作会更好，他会给国际和平斗士伯兰特·罗素写信，请求建立一个国际基金，资助“玻利维亚解放运动”。格瓦拉也接见了西罗·布斯托斯，这位阿根廷画家对其乡村游击战理论是否明智持怀疑态度。格瓦拉对布斯托斯说他的战略目标是夺取阿根廷的政权。

两天后，游击队营地就遭到政府军袭击。一架飞机轰炸了卡拉米亚庄园的周围地区。政府军杀死了15名游击队员，抓获了4名俘虏，其中包括两名“外国人”。格瓦拉的游击事业受到重创，德布雷和布斯托斯想要撤离前线，他们在走进小村姆尤帕姆帕的时候被政府军逮捕。

对德布雷的审判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对于格瓦拉来说，德布雷和布斯托斯被捕是沉重的打击，他们是格瓦拉向外界传递消息的唯一机会。据当时审问德布雷的人说，是德布雷最终证实了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消息。起初，德布雷说他是法国记者，跟游击队没有关系。可是随着审讯越来越严酷，他最终屈服了，承认被称为“拉蒙”的游击队司令实际上就是格瓦拉。

审讯员得知布斯托斯是艺术家，他们让他画出游击队员的样子。布斯托斯照做了，还画了游击队在尼阿卡瓦苏营地和窑洞的地图。德布雷和布斯托斯被捕后，格瓦拉和他的战友在丛林中披荆斩棘，长途跋涉，忍受酷热、寒风、大雨，到处寻找食物和水。他们一直寻找后方部队，可是始终没有找到。他们常常迷路，偶尔与政府军的巡逻队交火，哈瓦那电台是他们了解外面情况的唯一途径。几天后在一次战斗中，格瓦拉身边的人牺牲，他与游击队员失去了联系。

《切·格瓦拉传》记录了那个悲伤的时刻：

切躲在一大块岩石后面，用M-2卡宾枪射击。但是没多久枪管被一颗子弹击中，枪没法再用。他的子弹夹显然已经丢了，他没有武器了。第二枚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腿小腿，第三枚子弹穿过了他的贝雷帽。切的敌人见到了他最后的样子：切躺在地上，他的双手被绑在身后，双脚也被绑。身边是他朋友的尸体，他腿上的伤口在渗血。

1967年10月9日，切·格瓦拉遇害。享年39岁。

1997年，切·格瓦拉的遗骸终于被发现，并运回古巴。

格瓦拉纪念碑矗立在古巴中部的圣塔克拉拉，那是他在革命战争年代赢得重大军事战役胜利的地方。此后每年的10月11日被确立为古巴的“国殇日”。

“两面之词”

切·格瓦拉遇害之后，一场为德布雷辩护的运动在法国巴黎发起。

当年的法国《世界报》刊登了德布雷被捕的消息，也刊登了法国知识界致玻利维亚国家元首巴里昂托斯将军的电报，其形式如同一份请愿书。众多的签名者对德布雷的命运深感忧虑，他们呼吁保障德布雷的安全。在数十名签名者中包括了当时法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有保罗·萨特、玛格丽特·杜拉斯、雅克·拉康、弗朗索瓦丝·萨冈等人，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如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将军也关注德布雷的命运，为他的自由而努力斡旋。

德布雷1940年9月2日出生于巴黎一个律师家庭，16岁时赢得法国文科竞赛奖，18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巴黎高师。他年轻的时候，世界正处在一个非殖民化运动高涨的年代中，法国先从印度退出，接着又在阿尔及利亚面临困境，与此同时，民族独立解放的浪潮波及亚、非、拉三大洲。青年时代的德布雷充满政治激情，部分原因在于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的高足。这位出版过《保卫马克思》的著名理论家，在巴黎高师影响了许多著名的学生，米歇尔·福柯和德布雷都在影响之列，当年探讨革命理论的兴趣是那个年代的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师生的时尚。

德布雷在切·格瓦拉之死中所扮演的角色，使他成为被争议的人。

他回法国后持续不断参与政治活动，且有大量的文学和政治作品问世，经常引起媒体关注。然而有人声称要清算历史，只是一直没有确切的凭据。直到1996年，格瓦拉的长女在阿根廷首都发表谈话说德布雷被捕后可能泄密，遭到当事人的反驳，其中包括当年玻利维亚军方的特工头目，出来作证否认德布雷泄密。2001年，还有人在追究德布雷所谓的历史责任。

德布雷对这一段可疑经历的回答在他大量出版的书籍中，他从不同角度回忆和讲述。

2014年出版的《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是德布雷与中国哲学家赵汀阳的最新对话集。谈到对以往政治激情的反思时他说：“一切伟大的民族都需要（或者在他们活力最兴盛的时代曾经需要过）英雄的史诗、民族的传说、传奇的人物、国父（毛泽东、戴高乐、格瓦拉、曼德拉、华盛顿等）。然而革命也常常会在衰老中自我否定，反过来对付自己。反对滥用权力的无政府派起义最终会导致一个更强硬、更集中的政权。法国有过拿破仑，俄国有过斯大林，中国有过毛泽东，罗马有过凯撒。造反的精神最终变为被迫的服从，自发性变化为官僚化，不同政见变成正宗教条，这不是新东西。”

1967年德布雷被捕后，戴高乐将军亲自出面，向玻利维亚政府施加压力，政府相关部门和整个法国以及意大利都出面声援。德布雷的母亲是巴黎市议会的议员，也亲自出面，甚至还去见美国参议员。据说，玻

利维亚政府试图通过德布雷的被捕与法国交换军火、工兵营的装备以及训练空军飞行员。结果因为是多方出面，最后玻利维亚政府派军方负责人去巴黎见法国外交部长，被当面训斥。更替总统之后的玻利维亚新政府当中有要员具有左翼倾向，此人与玻利维亚共产党领导人有亲戚关系。最后在各种因素的组合作用下，玻利维亚政府军只好释放德布雷。获释之后，德布雷向法国的相关部门写过感谢信。

从此开始，德布雷更坚定了政治上的共和主义精神（他在哲学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运用极其娴熟）。在他的政治自传《可敬的大人物》中，他表达了对戴高乐总统的敬意。

十年之后，法国总统密特朗任命德布雷为外交事务特别顾问。

多年来德布雷穿梭于政治和思想界，穿梭于哲学和文化研究。青年时代的革命理想，在拉美丛林里与切·格瓦拉亲历游击战，这样的经历使他对世事有更为深入而透彻的理解。

2014年9月德布雷再访中国，此次访问中他再次回忆拉美革命。

再次重温他与切·格瓦拉共同经历的时光，也深省那段岁月带给他的启示。

（本文写作受益于《切·格瓦拉：玻利维亚日记》以及美国作家乔恩·安德森所著《切·格瓦拉》）



• 哈瓦那以东的度假胜地巴拉德罗出售给游客的印有切·格瓦拉肖像的钱包，最耐人寻味的是，它旁边就是美元图案的钱包。摄影/**Catalina Martin-Chico/Cosmos/DragonImage**

圣地亚哥：古巴革命的背影

名为“圣地亚哥”的城市很多，但唯有古巴的这座，洋溢着革命的浪漫与激情。或许，每一块墓碑下，都是一位革命英雄；每一栋老建筑里，都住着一段令人血脉偾张的往事……

撰文/顾剑



- 圣地亚哥的大街小巷和殖民地风格的楼宇。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 巴士驶过圣地亚哥安东尼奥·马塞奥革命广场。马塞奥是古巴独立战争军事领导人。摄影/**Bruno Morandi-DragonImage**

早春三月，无论波士顿还是北京，都还春寒料峭。若这个时间到古巴，却是30℃以上暑热难当的季节。为了躲开今年波士顿创下历史纪录的纷飞大雪，我专门飞到古巴避寒。

圣地亚哥是古巴第二大城市，在狭长的古巴地图的最南端，与首都哈瓦那分据南北。我到达的时候，火红的凤凰花在明晃晃的阳光下绽放，大王棕榈树笔直而挺拔，城市南面铺陈着一望无际的碧蓝海面，而西面的天际线上，则横亘着峰峦叠嶂的马埃斯特腊山脉。

当我每每从旅馆细长的窗口，望向那一隆起伏的曲线，脑海中总会浮现“革命”二字。1868 年，爱国领袖卡洛斯·塞斯佩德斯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亚拉小镇上发表了著名的“亚拉宣言”；1895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从多米尼加率领远征军在马埃斯特腊附近的普拉依达斯登陆；1956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起义军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斗争……

是啊，一线自然天成的山脉尚且引发了诸多的革命联想，那这座城市呢？

公墓里的古巴近代史

一清早，我乘出租车造访古巴最漂亮的公墓——圣伊菲热尼亚公墓。或许有人会忌讳坟墓不吉，其实西方的公墓绿草如茵、宽敞明亮，墓碑的工艺也很精湛，与公园并没多少区别。因此，在欧美旅行时，我一向很爱逛公墓，诸如巴黎的拉雪兹神甫公墓、莫斯科的新处女公墓，对于懂一点历史的人而言，墓园就是历史。

诚然，圣伊菲热尼亚公墓，也写就了历史。古巴两次独立战争的领

导人：卡洛斯·塞斯佩德斯与何塞·马蒂，以及古巴革命时期很多英雄都被葬在这里。

卡洛斯·塞斯佩德斯对于古巴革命以及这个国家的意义，只需看后人对他的称谓便能明了——“祖国之父”。1868年10月，49岁的塞斯佩德斯将朋友和奴隶集合到自己的德玛西亚瓜庄园，制定了“亚拉宣言”。

十天后，他的部队占领了巴亚莫，监禁了西班牙卫戍部队的降兵。他的手下费奥雷多为此写下了后来成为古巴国歌的诗句：

快起来，上战场，巴亚莫的勇士们！

祖国正骄傲地注视着你们，

不要惧怕光荣的牺牲，

为了祖国献身，就是永生！

“为了祖国献身”，在将近一个世纪以来，都是这个国家的一项传统。很快，领袖塞斯佩德斯顺理成章地当选总统，但卷土重来的西班牙正规军接连挫败了政府起义军，由于看不到战争结束和外交上的结局，起义者内部的分歧越来越大，塞斯佩德斯被赶下总统的宝座。1874年2月，55岁的他在一次小冲突中牺牲。毋庸置疑的是，虽然失败，但由他开始的十年战争最终导致了古巴的独立。

从塞斯佩德斯的墓地，踱步到何塞·马蒂的墓地，只需短短的几分钟。象征西班牙殖民时期各省的6根柱子高擎半圆形墓顶，阳光穿过墓顶的六边形天窗，洒在沉思的马蒂雕像上。石棺上是一面古巴国旗，四周鲜花环绕。果然是应了马蒂在诗歌中所写的——“当我长眠在异地，没有祖国，也不是奴隶。我只愿自己的坟墓上，放着一束花，一面旗。”而这诗的前几句是：

普天下的穷人，

我愿与他们共命运。

我是好人，作为好人而死，

我要面向太阳！

我更愿意以诗人的身份来理解马蒂。从老照片上看，他身材矮小，浓眉大眼，留着八字胡须，总穿着黑色的上衣，系着白色的领带。大部分时间，他作为流亡者居住在美国，坚定地倡导古巴独立。1891年，针对美国的威胁，他写道：“我知道这个怪兽，因为我曾生活在它的兽穴中——我的武器只有戴维和弹弓。”在20年的时间里，作为革命活动家、政治理论家的马蒂，不断地为古巴奔走。在一封给女儿的信里，他这样描述自己：

我全副武装，肩扛步枪，皮带上挂着我的砍刀和左轮手枪；一肩悬

挂着装有100发子弹的布包，另一肩悬挂着卷成筒形的古巴地图；在我的军用背包里，装有价值50英镑的药品、衣物、我的吊床、一张毛毯和书籍；你的照片挂在我的胸前。

这位刚过不惑之年的政治组织者，或许并不是一名优秀的游击战士。1895年，马蒂率领起义者奔赴古巴东部的奥连特省托河前线。5月5日，他与马塞奥领导的起义军在圣地亚哥附近会师。19日，起义军陷入西班牙人设下的埋伏，马蒂勇敢地骑着一匹白马冲锋陷阵。他先是颈部被一颗子弹击中，坠下马来。受伤的马蒂站起来，继续冲向敌人，再次被子弹击中——马蒂牺牲了，时年42岁。

每半个小时，马蒂墓前都有换岗仪式。对这位浪漫革命者的纪念，几乎遍及全古巴——每个城镇都有一个博物馆，每个学校外面都有一尊白色的半身石膏像。甚至，位于哈瓦那的国际机场也以何塞·马蒂命名。事实上，古巴许多广场和街道的名字也都与这些革命者相关。有些是为了纪念诸如何塞·马蒂这样的19世纪独立战争的英雄，有些则是铭记20世纪50年代古巴革命的风流人物。

圣地亚哥埋葬着古巴独立史上几乎所有名人，是打响古巴革命第一枪的地方。在这座城市漫步街头，我能依稀看见“革命的背影”，浮印得比哈瓦那更加清晰。



• 革命英雄的墓碑上是基督的雕像，这在古巴很普遍。摄影/顾剑

“任性”的革命传奇

从国家公墓到圣地亚哥火车站大约有3公里，继续沿着上山的方向步行，很快就可以走到市中心的塞斯佩德斯广场。不出意料，广场中央竖立着塞斯佩德斯的雕像，顺着雕像朝北望去，有一幢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西班牙建筑——这是多么充满戏剧性的一幕——1868年，塞斯佩德斯主导的独立运动胜利，正是在这幢曾经的西班牙总督府里，首次公开发

表了独立宣言。91年后，又一位革命领袖出现在这幢小楼的二层阳台，宣布古巴革命胜利。他，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的传奇故事，广为人知。他掌控了古巴政治和历史超过半个世纪，使古巴成为世界舞台中举足轻重的一员。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袭击蒙卡达兵营的行动算是一次重大转折，当时他还只是一个26岁的充满活力的青年。

蒙卡达兵营博物馆距离塞斯佩德斯广场不远，只需往东穿过两个广场便到。这是一幢四四方方、有着两层城垛的建筑，外墙上还有坑坑洼洼的弹痕，现在被涂上了带有白色条纹的亮黄色。但这仍然无法遮蔽它曾经的阴沉灰暗。20世纪50年代，作为仅次于哈瓦那哥伦比亚兵营的全国第二大兵营，蒙卡达兵营常被视为高压政府的象征。

1953年7月，卡斯特罗兄弟带领一百多名游击队员试图袭击并占领这里，同时发动全城的反政府暴动。游击队员们化装成政府军，想坐卡车混进驻军大院，计划突袭政府军宿舍。谁也没想到，由于他们脚上的鞋子没换，在大门口停车检查时被卫兵识破。战斗提前打响，奇袭被迫改成强攻，结果自然是寡不敌众，大部分革命者阵亡或者被处决。卡斯特罗兄弟也因此被捕、判刑，流亡墨西哥。在美国学者理查德·戈特所写的《古巴史》中如此评价这一事件：

这次行动是一次灾难性的失败，就像共产主义者们所形容的那样，是一次毫无准备的政变……但蒙卡达事件是对政权的一次挑战，它奠定了一个革命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将在不到6年的时间内取得政权。它也使得运动领导者的名字传遍了整座海岛。

如今，这座兵营保留了小部分展厅，纪念那次失败的行动，而大部分的建筑，则被改建成学校，不对外开放。我在学校门外，看到课间休息的古巴小学生，居然也戴着红领巾，顿时觉得这个黑皮肤的热带国度变得亲切了。

古巴革命和中国相比，更像城市游击战，或者说，还有点冒险故事的意味。诸如我听到过一个传奇性的革命故事：1953年，革命党人在一级方程式大赛前夕成功绑架了“赛车之王”方吉奥，非常礼貌地给予优待，还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大赛之后又释放了方吉奥。20年后，已经是阿根廷汽车公司老板的方吉奥，还回到古巴和当初绑架他的卡斯特罗把酒言欢。这真令我惊叹——活脱脱就是一个罗宾汉的传奇！

可就是这么不靠谱的战略战术，在古巴还真能奏效。后来，我旅行到古巴中部的圣塔克拉拉城，在城东见到古巴革命又一个传奇纪念地，一块纪念碑兀自矗立在锈迹斑斑的铁轨旁娓娓道来：当年切·格瓦拉率领18名游击队员，只带了轻武器，在此伏击政府的列车。这是一辆有22节车厢的装甲列车。最终，这辆列车以及车上350多名政府军，全部被这19名游击队员俘虏了！这听起来近乎天方夜谭。不过，我想事情发生的时间也许可以解释一切：1958年12月29日。3天以后，1959年1月1日，

就是古巴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日子，或许彼时巴蒂斯塔的政府军早已没有任何士气可言了。

从蒙卡达军营打响第一枪的悲剧开端，到圣塔克拉拉铁路之战的喜剧收尾，古巴革命的历史，就是这么“任性”的一段传奇。



● 圣地亚哥“卡里布小屋”俱乐部，这里是聆听非洲风味古巴音乐、观赏伦巴舞的天堂。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 只有在法式杜姆巴聚会上，才可以看到辛塔舞。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Eric MARTIN-DragonImage

社会众生相：革命的背影

尽管圣地亚哥随处可见革命遗迹，但似乎没有太多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个人崇拜。说起来卡斯特罗在古巴掌权半个多世纪，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不仅是他的亲弟弟，还是与他并肩战斗的第一代革命领导人。我在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卡斯特罗的标准像。大概唯一能看到卡斯特罗巨幅画像的地方只有一处，就是当地的古巴共产党党部。

反而倒是切·格瓦拉的头像，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切·格瓦拉受到古巴

全民的推崇，地位比卡斯特罗高。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已经去世，不必为现实生活中的政策失误负责，成了一个革命殉道者。古巴乃至全世界的人们，将格瓦拉的头像印在挎包、T恤、帽子上，并不是因为革命的理想，而是因为格瓦拉已经变成了一个大众化的通俗文化符号，代表非主流、叛逆，甚至是“酷”。

我认识几个女生，很迷恋格瓦拉。问她们原因，回答简单而直观：因为他帅！不知道她们是否了解当年格瓦拉的故事？懂得格瓦拉的政治理想、经济政策？而对卡斯特罗而言，当年的革命同事在通俗文化中受欢迎程度远远超出自己，他又该作何感想？

我在古巴更多看到的，却与革命没什么关联，甚至有些背道而驰。圣地亚哥的旅馆里，常能看见勾搭外国游客的古巴当地女孩，很多人都想方设法要从外国游客手里捞点小钱。一次，我偶尔举起相机拍摄路边的一个建筑，刚刚走过去的一位清洁工老头，居然回过头来找我要1比索。后来有个人更莫名：他看上去像是流浪汉，跟我打招呼说“你好”，非要跟我击一下掌，击完掌之后也是伸手要钱。圣地亚哥街头这些要钱的手段，倒也不难对付，只要打定主意不给钱，不理会，对方也不会纠缠。

当然，古巴不会一直沉浸在过去。虽然酒店和餐馆仍然以国营为主，但如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由政府特许经营的私立家庭旅馆。家庭旅馆的主人本身都是中产阶级，绝对热情可靠。他们很多人也有“海外关系”，言谈间，经常会流露出想培养孩子离开古巴去读书或工作的想法。古巴人也迷韩剧。我在圣地亚哥所住的旅馆，前台有一位漂亮姑娘，有一天她突然问我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得知我是中国人后，她略微有些失望，因为她在电视上看过不少韩剧，想找人聊聊韩剧！

革命，主义，这些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神圣的名词，在今天的世界已经没有多少人在意了。随着大众文化的普及，革命的符号变成了热卖的消费品。这是个平庸的年代，这是个物质的年代，但也正因为如此，这还是个和平繁荣的年代。古巴在这个时代大潮中，也未能幸免，但在这个被外界封锁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度，我想，当年革命模糊的背影还在……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NEW YEAR
CELEBRATIONS
东北年俗
当春节渐成往事

点击阅读

经典作家的古巴时光

古巴，因革命而浪漫，因美景而风情。这里，也吸引了众多的作家前往，酝酿出携带着雪茄味儿的鸿篇巨制。比如：海明威、马尔克斯，这两位曾经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们在古巴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古巴又带给了他们什么？

撰文/夏榆



● 海明威将古巴看作伊甸园和钓大鱼的天堂。如今，他用一种决不妥协的目光凝视着这个正在转型的国家以及那些幻想着另一个世界的年轻人。
摄影/**JOSE GOITIA-DragonImage**

“即使印第安人消失不见，甚至所有人类都消失不见，墨西哥湾流也会一直静静地流淌下去”，这是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旅居古巴时写下来的文字。

一生行旅不羁、四海漫游的海明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长期旅居古巴。“他的房子位于哈瓦那近郊的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地区。在房子西南一个外形方正的角落里，有一间特设的工作室，但他偏爱卧室，唯有小说里的角色能驱使他爬上角楼。”1958年，《巴黎评论》记者乔治·普林顿在古巴访问海明威时对他在哈瓦那的居所和工作状态有详尽的描述：“他是个严于律己、自我约束力极强的人，直到晌午时分，他才会拿起圆头手杖离开房子，到泳池边开始每日半英里的游泳。”

作为逝去时代的文学英雄，海明威影响过很多杰出作家。《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声称，海明威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晚年的时候，马尔克斯在巴黎遇到时为美国著名时装模特儿的海明威孙女玛尔戈·海明威，他们一起吃饭。“她滔滔不绝地谈她的祖父，而我则谈我的祖父”，马尔克斯说。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期间马尔克斯向外界讲述当年他初到墨西哥接到朋友的电话被告知：“海明威那老东西前一天早晨7点30分在美国爱达荷州的一个小镇凯特丘姆拿猎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花了”，马尔克斯追忆道：“这件荒唐事

如同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留在我的脑海里。”

强悍而脆弱——海明威在古巴

1957年秋天，海明威在古巴的寓所观景庄开始动笔写作《流动的盛宴》。

这是他对青年时期在巴黎生活的回忆。辞去新闻职业、决心从事职业文学写作的海明威饱尝生活的艰辛，经常要忍受饥饿、物质匮乏以及写出的作品被出版机构频繁拒绝。然而他有美好的爱情，有坚定的信念和持久写作的毅力。那段时光艰辛而精进，困顿而甜美。这是海明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三年之后对往昔岁月的追念。在此期间他偶尔回爱达荷州凯彻姆的家，在西班牙旅行时也在写作这本书。1960年春重返古巴观景庄完成初稿，同年秋天返回美国，在凯彻姆他的家中做最后润饰。就在这部回忆录完成的第二年，海明威在他的凯彻姆住所用一支猎枪向头颅开枪自杀了。

“他自杀那天，他的第四任妻子玛丽·威尔士·海明威睡在爱达荷州克川市海明威居所楼上的主卧室里，1961年7月2日早晨她被几声以为是‘抽屉砰砰关上’的声音吵醒”，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后来追忆他的文学榜样海明威。

强悍而脆弱，乐观又绝望，这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显示出来的双重性。1954年是海明威祸福相随的年头，这年，海明威遭遇意外事故的频率达到了最高峰。先是乘坐飞机到东非打猎时，两次遭遇飞机失事，落下脑震荡、脊柱碎裂、烧伤和内伤并被通报死亡。他幸存下来，也因此有了一次独特的读自己讣告的经历。据卡佛回忆，他在少年时看到过晚报刊登的海明威相关消息的新闻照片。“他正满脸笑容地举着一张报纸，那上面登着他的照片和宣布他死讯的通栏标题。”也是在这一年，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05年12月7日，我应邀赴斯德哥尔摩报道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瑞典学院常务秘书斯图尔·艾伦先生相邀参访瑞典学院。艾伦先生作为常务秘书在1987年为俄裔美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和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授过奖。满头银发的老人翔实解说诺奖历史上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奖或者缺席颁奖的作家。

海明威当年因为头部重伤而缺席颁奖典礼，在那次颁奖仪式上，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发表给海明威的授奖词：

现在我们大家谈论的正是这样一位先行的作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和他的任何一位美国同道比，海明威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屹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正在寻求准确方式来表达意见的朝气蓬勃的民族。海明威本人也与一般文人迥然不同，他在许多方面表现了戏剧性的气质和鲜明的性格。在他身上，那股勃勃的生机按照它自己特有的方式发展着，没有一点这个时代的悲观色彩和幻灭感。

诺贝尔博物馆与瑞典学院相邻，博物馆陈列着百年历史中获奖者的遗迹—生平影像、书籍影印、手稿、演讲音频。观众走进纪念馆可以通过遥控器，任意选择想要了解的获奖者的情况，戴上耳机就可以听到获奖者的演讲实况。海明威是我热爱的作家，记得当时特意找寻他的文学演讲而未得。现在我手里存有《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和获奖言说》，再次读到瑞典学院常务秘书的授奖词："人们应该记住，勇气是海明威作品的中心主题—具有勇气的人被置于各种环境中考验、锻炼，以便面对冷酷、残忍的世界，而不抱怨那个伟大而宽容的时代。"人性是复杂的。仿佛是对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做否定式证明，海明威后来生病，患上偏执狂和忧郁症，在接连两次监禁于梅约诊所时，因为接受了电痉挛疗法而失去记忆，最后用猎枪自杀身亡。

海明威生于1899年，可以算作20世纪的同龄人。他这一代人被称为"迷惘的一代"，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是残酷、冷漠和没有意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在幸存者身上留下了烙印，海明威本人也亲历其中，并于19岁在前线身负重伤。他说："人类莫名地疯狂。让自己陷入最巨大的、致人于死地的大屠杀中，这只有在人类的土地上才会发生。"

海明威的一生有过四次婚姻，其中三次离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意大利当救护车司机并为此负伤，在西班牙内战（1937-1939年）、中国抗日战争（1941年）和欧洲反法西斯战争（1944-1945年）中他作为战地记者表现优异。战后他的个人生活发生逆转，打猎、钓鱼、狩猎旅行、在法国和古巴寄居、斗牛、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最后在爱达荷州自杀，这是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的一生。当我再次阅读海明威，从他的生平轨迹寻访他的生命故事时，遥想他在古巴的岁月，或许就如他所言："必须天天面对永恒，或者面对缺乏永恒的状况。"



• 一位老人坐在科希玛海边凝视那位与他极为相似的大文豪。摄影/**JOSE GOITIA-DragonImage**阿

海明威与古巴的关系可谓深长。1940年他在出版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之后，与第二任妻子离婚，同作家玛瑟·盖尔荷恩结婚。次年，他与玛瑟来到中国采访抗日战争，当时还会见了蒋介石与宋美龄；之后

旅居古巴，在哈瓦那的瞭望农场住下来。海明威在哈瓦那多有惊人之举，改装私人渔船“皮拉尔号”，追缉古巴近海的德军潜艇；在此期间他以特派记者身份去欧洲采访，在伦敦遭遇车祸，头部负伤。为解放巴黎与游击队一起搜集情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海明威返回古巴。同年与玛瑟·盖尔荷恩离婚。

海明威一生都在谈论自杀，在他的有生之年，身体遭到种种重创，就像是和一个看不见的对手进行一场拳击赛之后留下的后遗症。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打猎，还是在创作中上前线打仗，海明威的意识中总抹不去“杀戮”的念头。他的一生都在狩猎：在非洲猎杀狮子、豹子和大羚羊，在落基山脉搏杀灰斑熊，在怀俄明农州射杀松鸡，在法国射杀鸽子，走到哪里他都会有可杀的猎物。即使在猎杀之后，这些动物仍然没有逃离他的视野。“杀戮”的意识使他饱受争议。

他的传记作者卡洛斯·贝克曾经讲述，在古巴时的某一天，海明威颇费了一番周折，钓到一条重达512磅（约合232公斤）的马林鱼，并将它运回港口，引起公众的一片欢呼。但他对这一切还不满足，大家喝酒庆祝之后的凌晨两三点钟，他又独自回到了码头，借着月色，用滑轮把大鱼吊了起来，当沙袋练习拳击。

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就是讲述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与大鲨鱼搏斗的故事，老人就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以北的海面上捕鱼。《老人与海》的写作，证明海明威是猎手兼博物学家，这部作品塑造了文学史上经典的硬汉形象，成为海明威最具代表性作品。《老人与海》出版于1952年，最初发表于9月1日的《生活》杂志。小说出版后获得批评界一致推崇，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奖并最终助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来好莱坞以重金购得摄制权，由斯宾塞·屈塞主演，拍成电影获得第31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老人与海》原作只有2.7万字，据海明威自述，他曾先后修改此书达200遍之多，可谓千锤百炼，炉火纯青。老渔夫圣地亚哥的状态来自海明威多年来在湾流中钓鱼的经历。他观察、研究海洋生态物候。“大海也同人一样值得描述。这是我的运气好，我见过马林鱼交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在那一片水面上，我见过五十多头抹香鲸的鲸群，有一次我叉住了一头几乎有六十英尺长的鲸鱼，却让它逃走了”，1958年海明威对来访的《巴黎评论》记者说道。

海明威在写作《老人与海》时有一句名言被广为传播：“一个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是《老人与海》的主题，也是海明威的人生信念。然而十年之后，海明威被他自己打败了。

魔幻超现实——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

说到作家与古巴的关系，不能不说到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交往。

1956年的巴黎。在圣米歇尔大酒店，当时还是新闻记者的马尔克斯与同为新闻记者的朋友普利尼奥·门多萨喝咖啡。其时他们都是具有左翼政治倾向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讨论到当时拉美的政治局势，包括古巴的政治变革。他们认为古巴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小伙子的努力上。“那个固执、莽撞的瘦高个儿的青年，正在墨西哥四处活动”，马尔克斯在他的自述中写道。

马尔克斯1927年3月6日生于哥伦比亚阿拉卡塔卡。少年时因哥伦比亚内战中途辍学。青年时期时任新闻记者的马尔克斯因连载文章揭露被政府美化了的海难而被迫离开哥伦比亚，后任《观察家报》驻欧洲记者，不久该报被哥伦比亚政府查封，他被困在欧洲。同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枯枝败叶》。1959年马尔克斯为古巴通讯社“拉丁社”在波哥大和古巴工作。“拉丁社”由切·格瓦拉领导，同年，马尔克斯应邀参加古巴革命胜利庆典。

其时，对马尔克斯来说，卡斯特罗的名字并非完全陌生。保守派政府在1948年企图将卡斯特罗和另外几名大学生以某桩凶杀案的嫌疑凶犯逮捕。卡斯特罗在1959年革命成功后，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在加拉加斯美岭区旅馆的阳台上庆祝卡斯特罗的胜利。在马尔克斯看来，古巴革命意味着一个与以往迥异的、具有质的飞跃的唯一运动。“不是资产阶级抑或人们早已熟悉的政治寡头打败一个先前按照顺序篡夺权力的独裁者，而是从山上下来的一些大胡子游击队员领导全体人民夺取了政权。这在整个拉丁美洲引起人们的赞叹、支持和深深地忧虑。”

当年的拉丁美洲，独裁者们像熟透的果子落地一样纷纷垮台。首先是阿根廷的胡安·庇隆，继而是哥伦比亚的罗哈斯·皮尼利亚，随后是委内瑞拉的佩雷斯·希门内斯。后来就轮到古巴的独裁者巴蒂斯塔倒台。同许多拉丁美洲人一样，马尔克斯希望到哈瓦那亲眼看一看那场汹涌澎湃的革命。1959年的春夏之际，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带着简单的行李，被一架由古巴人驾驶的双引擎飞机带往哈瓦那。飞机是革命者从前政府军缴获而来，是一件散发出难以忍受的尿骚味儿的老古董。他们参加报道“真相行动”—由卡斯特罗指挥的对巴蒂斯塔独裁政府的战犯的公开审判。

到达哈瓦那，马尔克斯和他的同行者立即被淹没在旗帜、橄榄绿军服和睡不着觉的人海中。人们没有工夫睡觉，对获得自由的庆祝与欢呼使他们难以入眠。马尔克斯与同伴走遍了哈瓦那，与人交谈，听卡斯特罗面对百万同胞讲话，从而触摸到了古巴革命的脉搏。为了让世界知道革命之后的古巴对独裁者的审判，卡斯特罗请来一些国家的观察员和记者旁听审判。

《马尔克斯传》描述了这次哈瓦那之行：“体育场内人山人海，正中央的四方框架里是身穿蓝色囚服面对法庭的罪犯。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直接面对着被审讯者，因而感觉到一个人死到临头的冷漠和恐惧。戴着手铐的被告惊愕于急切等待将他明正典刑的观众的呼喊、谩骂和笑声，他的眼睛呆滞，一直盯着脚上的意大利皮鞋的尖端，直至黎明时分听到死刑的判决。”这次审判给马尔克斯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他从没直接写过这一审判，然而他从对战犯的审讯、审讯时出示的大量的证据材料中受到启发，构思了他的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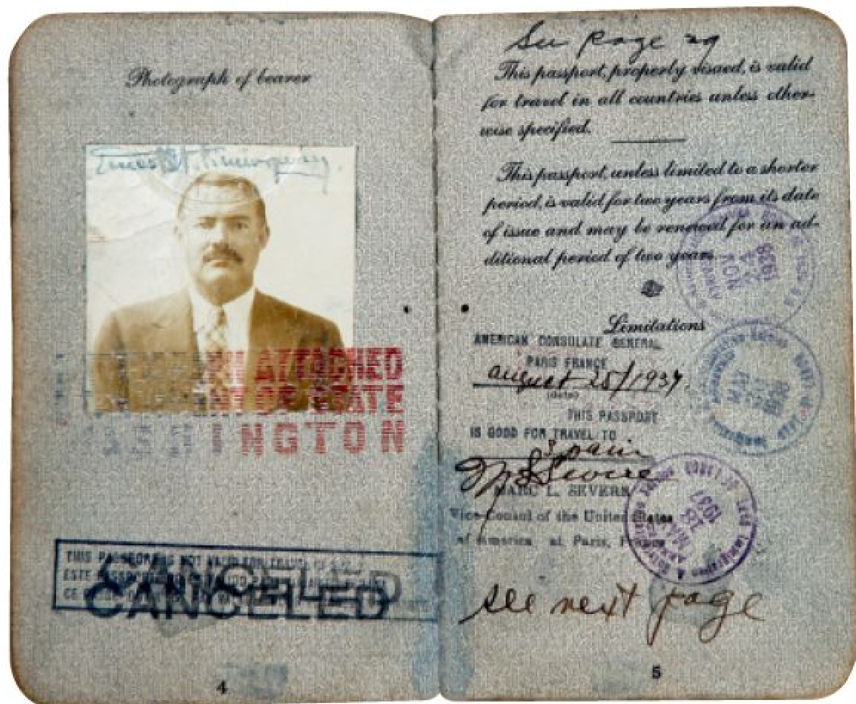
马尔克斯第一次见到卡斯特罗也是在哈瓦那。当时他途径卡马圭市作短暂停留。担任司令官的卡斯特罗在古巴腹地参加几个养鸡场的开工典礼也抵达卡马圭市。到了这里的小机场，饿坏了的司令官命人拿鸡给他吃，可是没有鸡。于是，卡斯特罗就以在美国旅客仍然经过的一个机场没有鸡吃这一弊端为题，发表了冗长而激动人心的演讲。经过他人的引荐，马尔克斯跟卡斯特罗会面握手，简要交谈，说明他的记者身份。

马尔克斯在哈瓦那待过90个日夜。当时的哈瓦那成为一座巨大的街垒，因为毒瘤般的反革命活动天天发生，而且古巴人还得防备着美国即将发动的入侵。马尔克斯所在的拉美通讯社所在的斜街不像街道，更像一条准备战斗的战壕：房上堆着沙袋，地下铺着厚厚的木板，枪支时刻处于伸手可及的位置。“哈瓦那是个不眠之城，犹如整个古巴是个不眠之国。拉美通讯社的工作人员在电传打字机、打字机或者照相机旁边困得要命，却几乎没有工夫打个盹”，《马尔克斯传》的作者达索·萨尔迪瓦尔写道。



● **Floridita**酒吧被作家海明威看作代基里酒的发源地。图为吧台一角的海明威青铜像。摄影/**JOSE GOITIA-DragonImage**





●海明威使用过的打字机和他生前的护照。摄影/JOSE GOITIA-DragonImage

后来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成为密友。据说卡斯特罗拨给马尔克斯一辆奔驰280，在哈瓦那市中心给了他一所带游泳池的房子，里面有4个佣人和1个花匠，还有一条只有极个别接待外宾的宾馆才能安装的国际电话线。据说卡斯特罗和马尔克斯无话不谈，包括倾诉内心的秘密。

“你仔细听着，我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亲密的、以真挚的感情维系的友谊是从文学开始的。1960年我们在拉美通讯社工作的时候，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跟他打过交道。我当时觉得，我们没有多少话可讲。后来我成了著名的作家，他成了举世闻名的政治家，我们双方怀着非常尊敬、友好的心情见了好几次面，不过当时我并不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能超越我们在政治倾向上的亲近。”这是马尔克斯与友人浦里尼奥·门多萨的对话。

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拉美文学热潮开始飙袭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就在这一年，马尔克斯与门多萨做过一次长篇对话，对话集《番石榴飘香》也风靡中国。这次对话中，门多萨评论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的关系时说道：和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不同，马尔克斯不热衷意识形态的问题。他和卡斯特罗的友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有着同样的看待现实和理解问题的方式，加以加勒比海地区所特有的共同语言。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密友，但是他和苏联政府官员以及统治共产主义世界的阴郁的官僚没什么交情。如果用许多欧洲知识分子的苛刻眼光来看待马尔克斯，那么很难在政治上理解他。对于他来说，勃列日涅夫是一回事，而卡斯特罗是另一回事，尽管古巴制度的许多特征来自苏联模式。然而支持军事独裁的拉丁美洲右派对马尔克斯深恶痛绝，把他视为卡斯特罗的代理人。“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钱分给穷人呢？”他的敌人责问他。

在访谈中门多萨向马尔克斯提问：“如果古巴把苏联那一套制度作为自己的样板，那么你说的‘更加公正、更加民主的社会制度’肯定会像在苏联那样受到非议。你难道没有这种顾虑？”马尔克斯回答：“依我看来，古巴革命在经历了最初几场巨大的风暴之后，正在艰难地有时甚至是矛盾的道路上行进，不过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更加民主、更加令我们大家满意的社会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前景。你们始终坚持‘古巴是苏联的卫星’的偏见，而我却不以为然。你只需跟菲德尔·卡斯特罗打一分钟交道，就会知道他不听任何人发号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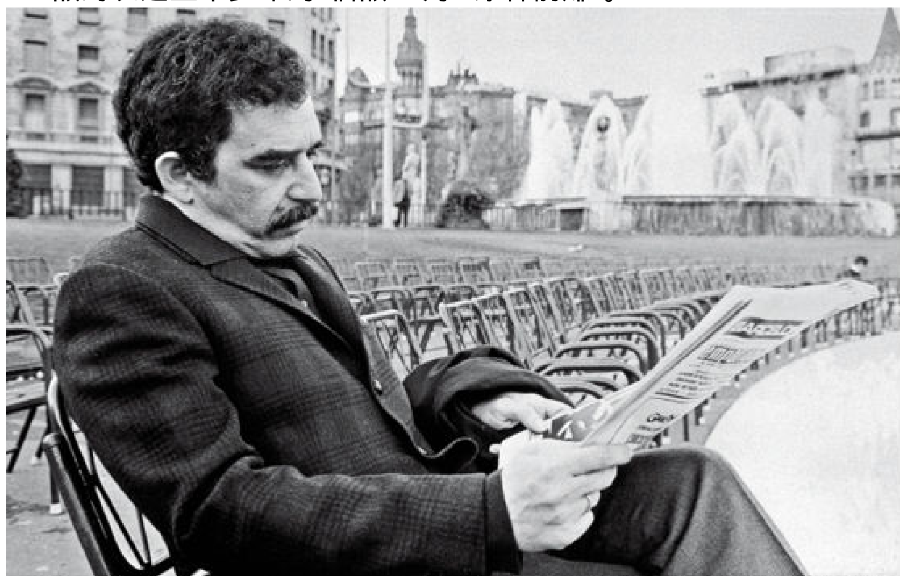
1962年，加勒比海地区发生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中程弹道导弹雷神导弹和朱比特导弹，苏联为挽回战略劣势，在古巴部署导弹。这是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国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谈到古巴和美国长期以来的紧张关系，马尔克斯说：

我认为，二十多年来，古巴革命一直处于危急状态，这要归咎于美国所持的不谅解和敌视的态度，他们不能容忍在离佛罗里达九十海里的地方存在这样一个样板。不能责怪苏联，如果没有他们的援助，就不会有今天的古巴革命。只要这种敌意不消除，古巴就只能处在危急状态之中，被迫进行自卫以谋取生存，被排除在它所在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区域之外。哪一天这一切都正常了，我们哪一天才能进行对话。

2014年4月17日，马尔克斯病逝于墨西哥。

2015年7月，美国与古巴恢复自1960年以来断绝的外交关系。

敌对长达五十多年的“宿敌”终于“冰释前嫌”。



• **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供图/**Stringer**-东方**IC**



• 马尔克斯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合影。
供图/**Krzysztof Wojcik**-东方**IC**

特立尼达：苦与甜的迹忆

在特立尼达，历史不是写在书本里的，而是刻在那些斑驳的彩色建筑、浑圆的鹅卵石街道、永不褪色的标语上。可爱的特立尼达人，虽然行走在历史中，虽然物质匮乏，却用音乐、耐心和创造力，让自己的生活和城市变得甜蜜而美丽。

撰文/李溱 摄影/陈阳



• 在今天这个看起来颜色绚丽的特立尼达，深入进去，还是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窘迫，物质生活上捉襟见肘的匮乏。

摄影/Bruno Morandi-DragonImage

和古巴许多城市一样，特立尼达，也是不大有底气和欧、亚、非那些动辄数千年的城市讨论历史的。1514年，贝拉斯凯斯才在这里建立了定居点，它，成为了古巴的第三座城市。不过，自从建城以来，它一直都是不温不火、慢吞吞地成长，直到19世纪蔗糖业的兴旺，特立尼达才飞速成长为一个处处充满了甜蜜味道的小城。短短的几百年间，特立尼达跟随着峡谷里蔗田的起伏而风起云涌，每一季的花样年华，都没有成为过去，而是留下来，折射出了五光十色。

20世纪50年代，古巴政府为了留住特立尼达的独特记忆，确立了其古巴“国家纪念碑”的地位，并下了限制令，不允许进行新的开发，这也使得特立尼达顺理成章地在1988年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所以，今天的特立尼达，四处撒满了属于某个时期的记忆。当你接近这些记忆的时候，甚至能够听到它们的呼吸声。



• 马约尔广场是特立尼达的中心，广场上耸立着高大的国王棕榈和城市保护神特尔西科雷女神雕像，这里自然也是游客聚集之地。



• 提起特立尼达，几乎所有的旅行书籍都会写到，这是一座色彩斑斓的城市，有着五颜六色的房子。

城市底片

卡斯特罗，是古巴雪茄绝佳的代言人，他那些抽着雪茄的照片，是古巴的经典一幕。如果你看得足够仔细，就会发现在老卡手中经常出现的雪茄，有着优雅而修长的身形。这是特立尼达为老卡专供的雪茄，它与著名的高斯巴（Cohiba）雪茄是同根兄弟。特立尼达为卡斯特罗特制的旗舰雪茄——Fundadores（创始人的意思），和特立尼达一样美丽，茄衣颜色较淡，甚至带有一点烟叶未成熟时的淡绿色。而特立尼达城的创始人呢？是迭戈·巴拉斯凯斯——哥伦布的爱将，这里是他为西班牙在古巴创建的第三座城市。迭戈·巴拉斯凯斯为特立尼达城“撰写”了毫不含糊的来历，使得这座城与这根雪茄类似——口感丰富、带着土味，骨子里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

特立尼达还有个别名：城市博物馆，这似乎是个近乎于俗气的赞美。但是，当你走在特立尼达的大街小巷，才会意识到这个名称是多么的贴切。不仅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遍布了全城，而且整个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偌大的博物馆，把城市的记忆，都活生生地保存在生活之中。

古巴有很多叫“马约尔广场”的地方。本来嘛，“马约尔”在西班牙语里就是“最大”的意思，自然地，特立尼达的中心，也叫马约尔广场。在这座城市里最大的广场四周，围绕着无数个博物馆，可是在特立尼达，专门去逛博物馆，实在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譬如罗曼蒂克博物馆，收藏了许多波西米亚风格的制品，还有捷克的水晶杯和餐具，很精致，却似乎离特立尼达的内核很遥远。

如果，你舍得离开马约尔广场，走进周边四通八达的小巷子，你会

发现无数至今保存完好、仍由普通居民使用的庭院式住宅。沿着那些没有车来车往，如迷宫一般的街道，漫步在寻常百姓生活中，丝毫不逊于参观任何一座博物馆。这些不着痕迹的优雅，都来自于鼎盛时期辉煌的底气。

时至今日，“嗒嗒”的马蹄声还清晰地回响在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马车载满蔬菜、瓜果和人们的期盼，走过一家家的门前。生活的步伐依旧像是过去一样缓慢，面对蜂拥而至、前来朝拜人类文化遗产的游客，它显得从容不迫，看不出城市的脚步有丝毫变化。



- 马约尔广场是特立尼达最大的广场，当年的豪门大宅，如今已变成了一座座博物馆。

生活实景

特立尼达的历史，其实并不是这样一直的快乐和轻松，它的欣欣向荣，是建立在蔗田、糖厂、万千奴隶的血汗之上的。独来独往的加勒比海盗也没有放过特立尼达，两次集结令，特立尼达两次沦陷。海盗们掠夺钱财、女人和奴隶，杀死所有有抵抗能力的男人并烧毁了整个城市。特立尼达城的街道，设计得杂乱无章，还有现在路边的隔离墩，依然是一尊尊当年抵御海盗时所使用的铜炮，这些都是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其实，就是在今天这个看起来颜色绚丽的特立尼达，深入进去，还是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窘迫，物质生活上捉襟见肘的匮乏。在街上，很少能够见到随处乱扔的垃圾。或许这和环保并没有关系，是因为在古巴，在特立尼达，能纳入垃圾范畴的东西很少，每个家庭都有变废为宝的精神。我们住的CASA（民宿），算是特立尼达比较富裕的人家，可是用完的牛奶盒子和塑料袋，都被洗得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地晒在后院，准备再一次使用。

清晨的特立尼达，是最美丽的时刻。我们总是舍不得睡懒觉，早起

看看日出、四处逛逛，开始一天的行程。有一天，那么的早，连马约尔广场都还没有睡醒，只有执勤的警察。我们向他打听了一些情况，赶着去看日出。准备和他告别之时，那厢迟疑了一下说道："我有一个5岁的女儿，很可爱，很乖，你们有没有礼物给她呢？"那样地彬彬有礼、那样地闪烁其辞，弄得我们不好意思起来。"我们只是随意出来走走，没有带礼物呢。可是，如果你不介意，能帮我们买一份礼物给你女儿吗？"他坦然地接过了我们递过去的2个红比索。

翠西，是我们住的这家CASA的女主人。她丈夫是个乐手，每天都在绿荫环绕的庭院里练习，音乐如同海浪一波又一波地涌来，明亮、温暖的音色，让人感觉舒服极了。她的奶奶和我们商量晚上吃什么，一只大龙虾只需要8个可兑换比索，我们立即要了一人一份——每人一只完整的龙虾。

晚饭前，我溜到厨房里看老奶奶做饭。雪白的龙虾，带着通红的壳，浇上红红的酱汁，还有用植物油烧得嗞嗞作响的酸橙和香料末。那么大的龙虾啊，冒着腾腾地热气，还没有到口，我们就开始盘算着下一顿还要再吃它！

餐前的沙拉，只有切成丝的紫花椰菜和洋葱，仅淋了些油醋汁，我们也不计较。终于等那大龙虾上来了，费了好大的劲儿切了一块，放到嘴里，立刻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这么美味的东西，竟然被他们做成这样，又老又硬、粗糙的纤维丝丝缕缕地塞到了牙缝里。龙虾肉和酱汁，各自倔强地不肯融合在一起。配饭倒是色彩宜人，白米掺入了黑豆和红色的菜豆，调了金黄的藏红花汁，可是吃了一口，腮帮子都疼了。这半夹生的豆饭咀嚼得真是辛苦。食，还是古巴最乏味的一个环节，原材料的匮乏，使得民以食为天，成为最没有想象力的古巴生活。

面对历史遗留的沉重，面对现实给予的窘迫，特立尼达人却选择了不以为然和尽心尽力，在几近没有选择的物质生活中，离析出一种属于乐观的态度。生活中的艺术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去支持的，在这样贫瘠的生活中，人们并没有余力去营造它们。如果，你认为他们会放弃对美的追求，那么你错了，任何有颜色的、有图案的东西，都会被视为一种美的装饰。塑料工艺品、简陋的画、粗糙的陶器，甚至一小块碎花布，都被认真地看待和收集起来，郑重其事地摆在适当的位置。

特立尼达和古巴其他地方一样，热爱各种鲜艳的颜色。一提起这座小城，几乎所有的旅行书籍都会写到，这是一座色彩斑斓的城，有着五颜六色的房子。是的，在这里，房子有着一切漂亮的颜色：蓝色、橙红、明黄、粉红、翠绿……可你也一定会看得出来，色彩，是这些房子唯一可以不断更新的装饰物。没有精雕细琢的纹饰，没有雕梁画栋的堂皇，只有随手可得的颜料，努力地粉饰出一派锦绣光年。在热带的阳光下，这些颜色被洗练得错落而有层次，加上五颜六色的玻璃和精致的窗户格栅，轻而易举地惊艳了每一个到来的人。

匮乏的物质生活，因为这样一种被珍视的态度和反复的摩挲，生出

不一般的柔美，不禁让人由衷地尊重。



● 特立尼达，罗曼蒂克博物馆。原来是大奴隶主**Borrell**家族的家宅，里面几乎所有的摆设和用具，包括这精美的花瓶都来自遥远的欧洲，带着波西米亚的味道，窗外就是圣弗朗西斯科·阿西斯古修道院的钟塔。





● 特立尼达，城市历史博物馆。有着摩尔式风格的庭院。7世纪，摩尔人来到了伊比利亚半岛，从那时起，西班牙地区出现了穆斯林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融合，之后，摩尔式的建筑风格又随着西班牙殖民者来到了美洲。

咖啡味道

翠西的奶奶，非常努力地把可怜的几样食材尽量做得可口，可尝试了几个晚上以后，我们还是决定放弃CASA的晚餐。不过，每天一大早，翠西奶奶的咖啡香还是能如约唤醒我们。

古巴人喜欢喝咖啡。古巴政府给每个家庭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的本本上，就写着每月每人6盎司咖啡，每盎司0.06比索。有了咖啡那妥帖、安心的味道，粗糙的生活似乎变得细腻起来。

在特立尼达热闹的街道上，我们发现了一家小小的咖啡馆。十多平方米的空间，两人宽的大门，在这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委实不显眼。更何况，除了早上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其他时间大门都紧闭着，我们从它门前路过了好几次，终于发现了其中的乾坤。

这种叫1比索的咖啡馆是单纯到顶点的咖啡馆，除了咖啡，什么都不卖，而且只卖一种咖啡，一个土比索一杯。咖啡用半个拳头大小的白瓷杯子盛着，一口就能饮尽。比起动辄几个、甚至十几个可兑换比索的、向外国游客售卖的咖啡，它更具有古巴的味道——苦涩和甜蜜水乳交融般地在一起，难分难舍，就像生活本身。

一日吃了午饭出来，发现烈日下1比索咖啡馆门前的队伍蜿蜒了二十来米。小小的门口挤满了等待的人，他们不急不躁，相互交谈着什么，其乐融融。等了半晌，门终于开了，里面贴着两侧墙壁一共摆了10张小圆桌。小圆桌真是小，年轻的女孩子可以挤下两个，年纪大的女人或是男人就只能独自坐了。中间仅容一个人的通道，留给了一个年轻的、熟练地穿梭于各个圆桌之间的男侍者。

小小的咖啡馆内，每一个维度都充斥着浓郁的咖啡香。小圆桌上只放了一大玻璃瓶的白糖。这里的咖啡，要加上很多很多的糖，反正特立尼达最常见的就是糖。在黑咖啡里狠狠地放下一大勺子白糖，咖啡一下子溢至杯沿，我意犹未尽，又小心翼翼加了半勺，咖啡微微凸出了杯沿。就着桌子，轻轻地抿了一小口，方才用小铁匙缓缓地搅拌均匀。

咖啡和糖几乎是一比一的浓度，甘洌的苦和浓烈的甜掺和在一起。这么单纯的甜和苦，却让人喝得唏嘘不已、百感交集。

在1比索咖啡馆，我们还看到这样一幕。一个妇女从队伍中走过来，掏出1比索，塞到外国游客手里：去吧，拿去喝杯咖啡吧。或许她认为，没喝上这1比索的咖啡，一定是很苦的生活吧。

革命前传：古巴的殖民历史

自哥伦布1492年10月27日发现古巴那一刻，也许就注定了这座岛屿近400年被殖民的苦难。无论是西班牙人的疯狂掠夺、英国人的短暂统治，还是美国人的强行介入，都不能磨灭古巴人民的起义和反抗。从印第安酋长阿图埃伊到哈瓦那大学的法律系毕业生菲德尔·卡斯特罗，寻求独立的种子早已种下。

撰文/孟繁勇



● 位于圣地亚哥的圣佩德罗德拉罗卡堡**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座城堡设计于**1673**年，**1700**年建成，是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复合建筑体。城堡根据海角的地势而建，作为防御城堡来抵抗外敌入侵，包括有堡垒、军火库、工事和大炮，是西班牙殖民时期拉丁美洲军事建筑里保存得最完整的一个。摄影**Sergi Reboredo**-东方**IC**

在古巴哈瓦那港口不远处，有一座雷尔弗埃查城堡，这是一座两层的方形建筑，灰色石墙上至今保存着古式加农炮，四角棱堡环绕，气势雄浑。若沿梯而上，站在城堡的小阁楼上，会发现这里地理位置绝佳，伴随着港口的海风，哈瓦那整个城市展现在眼前。甚至远方小街巷的行人，都会看到你向他们挥动的双手。

许多人会在城堡前留影，却少人知晓，游人如织之处，恰是西班牙殖民古巴的遗迹：这里曾是西班牙总督的官邸和办事处。虽历尽风雨，斑驳石墙仍无声地诉说着西班牙殖民者的权势，他们所签发的命令，将决定古巴殖民地的命运。

若你有机会临此，当轻触石壁，穿越时光的缝隙之时，便会发现雄伟的堡垒之中，深藏着被殖民者的苦难……



● 出自“阿托卡夫人号”沉船（**Nuestra Senora de Atocha**）的金盘子，边缘上的小凹痕说明它在大西洋的海浪中经受了**350**年的洗礼。**1622**年**8**月，“阿托卡夫人号”护卫舰由**29**艘护航船组成的船队满载着西班牙殖民者从南美洲搜刮来的财宝返回西班牙，却在哈瓦那以及古巴之间的海域遭遇飓风袭击，“阿托卡夫人号”由于载重太大，航行速度最慢，无法逃脱此厄运，连同满船财宝沉入海底。供图/**FOTOE**

发现古巴

1492年4月17日，西班牙国王同意了哥伦布的书面协议草案。哥伦布提出“作为海洋领主的陛下，委任他（哥伦布）为一切海岛和大陆的司令，这些海岛和大陆是他亲自发现和夺得的，或者是由于他发挥了航海技能而发现的，陛下把哥伦布封为被发现和夺得的海岛、大陆的副王和首席执行者。”作为交换，西班牙国王将得到回报，数目是哥伦布获得的一切商品，无论是黄金、白银、香料或其他货物的十分之九，而哥伦布留下十分之一。

得到国王允许的哥伦布，于当年8月3日启航，率领着庞大的舰队向西而行，开始新航路的远洋。10月27日，哥伦布发现了古巴岛，但他认为这里不过是大陆而已，并没有过多停留。直至1508年，哥伦布再次来到古巴，为了搞清这里究竟是不是大陆，命令其部下迪戈·贝拉斯克斯绕着古巴岛沿线航行，发现这里是一个岛。于是，迪戈·贝拉斯克斯带着300名士兵在巴拉科阿登岛，对这个岛进行勘察，后来他成为西班牙殖民古巴时期的总督。他看到了这里生活着的，是一些瓜纳哈达贝伊人、西博内人、泰伊诺人和太平洋原始部落土著印第安人。

土著人原始的武器，无法抵抗西班牙人的枪炮，于是他们被迫接受条件。哥伦布规定凡14岁以上的印第安土著居民，每年必须四次缴纳一定数量的黄金或者是棉花，作为捐税和贡品，否则便提供无偿劳役，成为古巴被殖民初期所遭受的掠夺苦难的开始。

之后，哥伦布掠夺而来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向西班牙，但国王得到的却很少。于是，哥伦布的权力逐渐被收回，由此开始，西班牙王室取代冒险家们，开始全面征服和殖民统治古巴。

在古巴东部，有一个叫作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地方，这里是西班牙在古巴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统治者叫做尼古拉·德·奥万多。1951年，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开始，殖民运动开始有计划、成规模地扩展至古巴全境。每到一处，西班牙人会将当地的印第安人登记在册，并强行命令当地人劳动，为此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劳动体系，后来成为古巴殖民时期组织生产的固定模式。

因西班牙殖民者的进入，古巴文明本按自己特有的轨迹发展的逻辑被强行打破，史学界将此称为“西班牙的征服打断了他们的任何进度的独立发展。”生活在古巴的居民，都被殖民者按照种族、阶级、原籍、裔系分割开来。古巴人类学家费尔南多·奥拉兹认为：“随他们（指西班牙殖民者）而来的有大量弹药、帆船、国王、教会等，一场革命性的剧变颠覆了古巴的印第安人，彻底地撕裂了他们原有的制度体系，并毁灭了他们的生活。”

1513年，古巴的土地被宣布为西班牙国王的财产，阿拉贡的斐迪南为此颁布了一项法令，授予未来的拓殖者以权利和义务。于是，来自西班牙的探险者们开始在古巴横行，他们四处寻找财富加以掠夺，在奥连特省找到黄金，在圣地亚哥找到了铜矿。仅殖民统治之后的30年，从古巴运输到西班牙的黄金就达到84000盎司之多。

殖民者不仅带来了疯狂的掠夺和野蛮的屠杀，随着西班牙人不断来到这块新大陆，他们还带来了欧洲的疾病，印第安人也因此在殖民时期人口大量减少。残暴的殖民统治，也引起古巴人民的反抗，起义、独立运动等反殖民斗争，一直在西班牙统治古巴数百年期间不断出现。



• 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美国人对当地的剥削非常严重。农业、通讯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被美国公司控制。图为古巴的农业工人。供图/**FOTOE**



• 1898年6月22日，美西战争期间，美国军队在古巴登陆。供图/SIPA

反抗殖民的岁月

古巴历史记载的第一个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英雄，是印第安酋长阿图埃伊。他反对西班牙人的入侵，并建立了一支由泰诺人组成的抵抗力量。但是因武器相较殖民者的落后，抵抗终被击溃，阿图埃伊被抓获。殖民者煞有其事地审判了他，并且几个以殖民者为主的“法官”，判处他以火刑。

在关于阿图埃伊的传说中，在临刑之前，西班牙人问他还有什么遗言，阿图埃伊要求请一个牧师，为他描绘一下天堂里的情形。牧师来了，向他讲述了天堂美景，阿图埃伊问，西班牙人是否也会去天堂？牧师告诉他，西班牙人中，也有好人。阿图埃伊的回答是，他不愿遇到西

班牙人，他们侵占了他的家，并且把男人和女人抓走当作奴隶。如果天堂里有西班牙人，那么他宁肯去地狱。

现在，在阿图埃伊遇难处，为纪念他而竖立了一尊半身雕像，不屈的姿态和坚毅的神情，诉说着这位反抗西班牙殖民英雄的往事，被后世尊称为古巴的国家英雄。

以阿图埃伊为始，西班牙殖民古巴期间，各地不断掀起反抗殖民者的事件，规模较大的则是古巴历次的独立运动。1868年10月10日，来自奥特连省的律师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在德米哈瓜庄园释放黑人奴隶，并将旧式步枪和梭标发给他们，率领这些黑人发动武装起义，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

随后，塞斯佩德斯在雅拉召开起义者大会，告诉所有人，起义的目的在于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开启了第一次古巴独立战争的序幕。这次起义声势浩大，短时期内席卷古巴，所到之处欢迎者众。以至于当时在古巴的法国记者伊帕里特·瓦泰马尔在报道中写道："起义者领袖塞斯佩德斯能够指望国内一切青年的同情……在古巴没有人能够对起义者所举起的旗帜袖手旁观。"

西班牙殖民者对此采取了残酷的军事镇压，战争持续了十年，直至1878年2月10日，双方签署了《桑洪条约》。条约中规定，古巴必须停止武装斗争，作为条件，西班牙答应在古巴实行政治改革并释放政治犯，而对参加十年战争的奴隶，给他们以自由人的身份。但此时古巴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仍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桑洪条约》的签署，事实上使得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失败，之后殖民者却并未实行任何改革。自1878年至1895年，西班牙统治者与被殖民者的矛盾不断加深，每一个古巴人都知道，他们不会永远忍受殖民生活。反对殖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在地下悄悄酝酿，直至1895年2月24日，奥连特省的巴亚莫再次点燃了全民起义的导火索，史称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

起义领导者马蒂、戈麦斯和马塞奥等人，号召古巴人"跨上战马，为祖国而战，捐躯在棕榈树下"，为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而战。此后在1892年4月，在纽约成立了古巴革命党，马蒂被选为主席。这也是不同于第一次独立战争之处，古巴由一个政党而非起义领袖的魅力，来领导指挥古巴全民武装起义。

经过长期的地下斗争，在1895年1月29日，马蒂在纽约签署了古巴全国起义的命令。随后，古巴黑人、土生白人、混血种人手执砍刀加入了军队，向殖民者发起进攻。他们在燃烧的甘蔗园的火焰下，向殖民者发出了"独立或死亡"的口号。

独立战争进行到1898年初，起义者几乎解放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西班牙殖民者的统治濒临崩溃。但没有想到的是，在古巴独立战争即将胜利之际，美国政府以保护美国侨民为借口，命令军舰驶往古巴。

随着美国军队的介入，形势起了意料不到的变化。

美国的介入

美国对古巴的兴趣，是在1821年占领西属佛罗里达之后，美国人突然发现古巴近在咫尺。因条件所限，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希望古巴继续由西班牙统治，甚至认为如果古巴被迫从它与西班牙非自然的联系中分离，那么只能继续由美国统治。

最初，美国的政治家们试图从西班牙手中购买古巴岛，于是，在1948年，詹姆斯·波尔克总统向西班牙政府出价1亿美元，结果遭到拒绝。美国人并未放弃，1854年又出价1.3亿美元，同时还向西班牙透露，如果拒绝出售，“那么我们将以人类或者神的任何法律，证明我们有能力将它从西班牙手中夺过来。”

西班牙照例回绝，于是，一些美国的军官们则想复制占领墨西哥部分领土的方式“擅自入侵”。一些狂热分子小规模地尝试此法，但均以失败告终。美国等待着机会，1898年2月15日，停泊在古巴哈瓦那港口的美国军舰“缅因号”，突然发生了爆炸，258名美国军人随军舰沉入海底死亡。美国官方调查之后认为，军舰爆炸的原因来自于西班牙的一枚水雷，而西班牙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认为‘缅因号’不是被西班牙人或者古巴人有意识地毁灭的，而是由于船自身内部的爆炸。”

双方各执一辞，谈判无果之后，美国国会发布决议，要求西班牙撤出古巴。当年4月22日，美国海军封锁古巴港口。两天之后，西班牙向美国宣战。美国国会于4月25日，通过了向西班牙宣战的法案，美西战争正式开启，仅仅3个月不到的时间，西班牙以战败告终。

1899年1月1日，殖民统治古巴近400年历史的西班牙撤离了。根据1898年12月的《巴黎和约》，“西班牙放弃对古巴的主权及其他的一切要求”，并且明确了“该岛在西班牙撤出之后，应由美国占领。”美国总统麦金莱任命列奥那多·伍德为军事总督，将古巴分为7个军管区，美国自此统领古巴一切军政要务。

军事占领古巴之后，一位名叫鲁特的律师，被麦金莱选定为负责规划古巴未来发展的人。他同意军事总督伍德所提的古巴人支持美国兼并的观点，如果能够操纵选择确保选定的古巴人获胜，兼并的企图将会实现。3个党派参加了选举，但这次选举令美国人失望，其中两派要求古巴应立即独立，结果是具有独立思想的派别获胜。

此后，麦金莱命令伍德，要求古巴成立制宪会议，并于1901年3月2日签署了《普拉特修正案》。古巴制宪会议以24票对2票否决此法案，美国陆军部长路特却威胁古巴制宪会议的代表说：“修正案一被接受，古巴将可得到一个优惠的商务协定，如不接受，美国军事占领将要继续到修正案被接受为止。”

6月12日，古巴制宪会议最终以15票对14票通过，以一票之差，将

《普拉特修正案》作为附件列入古巴宪法，实际上古巴被剥夺了独立和主权。该法案的规定，仍然确保美国对古巴维持着一种殖民控制形式，古巴从此沦为美国附庸。美国实际上取代了西班牙，采取“统治而不兼并”方法，使形式上独立的古巴处于殖民隶属地位。

直至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哈瓦那大学的法律系毕业生，带着160名青年攻打蒙卡达兵营，发动了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古巴革命，由此拉开了序幕……

（参考书目《古巴史》、《古巴独立史》等）

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

智慧谷：为全世界种植甜蜜

在古巴为全世界提供甜蜜的年代里，位于特立尼达城东的洛斯印海尼奥斯谷地（又称智慧谷）也迎来了最甜蜜的日子。山谷的五十多家糖厂为这里的人们引来了南美的白银、非洲的黑奴、欧洲的精美建筑和亡命的加勒比海盗。如今，这一切记忆都保存了下来。

撰文/李溱 摄影/陈阳



● 特立尼达每天有一趟蒸汽小火车来往于市区和智慧谷，这辆从19世纪开来的蒸汽小火车，运走了无数的蔗糖，运来了众多的奴隶，带来了特立尼达的繁荣美丽，如今它带领游客们重温当年的甜蜜时光。

驶向种植园的老爷火车

在特立尼达，有一个只有一个站台的火车站。无意中遇到它的时候，夕阳将静止的火车拉出了长长的影子，安静、凋零、孤独。古老、黯淡的火车头停在轨道上，如果不是一位老铁路工人给予肯定的回答，我们几乎以为这是一个已经荒芜了的火车站。

老人很是热情，叨叨絮絮地连比带划。我们终于明白了每天早上九点，会有一班火车从这里开往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下午三点钟返回。

看着身边的这个火车头，似乎已经在这里停放了四五十年。一拉绳子，汽笛一声长鸣，有点力不从心，更像是喘气声。难不成就是这老爷火车将要带我们去往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

然而事实更出乎我们的意料，当次日清晨，那列蒸汽小火车喘着粗气，以缓慢地步伐准时出现的时候，我们不止是回到了几十年前，甚至回到了19世纪，回到特立尼达最甜蜜的年代。那时候，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里遍布了100多家大大小小的糖厂，忙碌的机器声、蔗糖的香味、温柔的山风，日日夜夜、缠绵不休。

这列小火车，拖着四面敞风的木车厢，“呜啦啦”向我们迎面开来的一刹那，实在是一个太大的惊喜。等车的人们，抓起相机冲了上去，和它结结实实地打了个照面。

车厢就像敞开的潘多拉盒子，飞出了更多的意外——硬木长凳、宽大的车窗没有玻璃、清凉的风……我们自由自在地在车厢中穿行，那位老铁路工人，抱着吉他径直走来，对着我们唱起了歌。如此古典的待遇，使得这一趟智慧谷之旅，始终像一个醒不过来的梦。

当窗外的绿色越来越浓的时候，蒸汽小火车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浓密的树林和蔗田，几乎是贴着车窗拂过。

山谷中的黑人后代

智慧谷本来是一块上百平方公里的山间盆地，土地肥沃。先有了特立尼达城，这里逐渐被开发为上等的甘蔗种植园，榨糖厂也随之兴起。很快地，这片峡谷便成为世界最大的食糖生产地之一。欣欣向荣的经济，为19世纪的特立尼达城的重建提供了资金。特立尼达市和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从诞生之日起就密不可分，所以，1988年，联合国评定世界文化遗产时，索性一股脑儿将山谷和城市捆绑在了一起。

从19世纪开始，蒸汽小火车就每天不爽约地穿行在山谷里，这条铁路，也成了一段甜蜜的记忆。小火车拉着满满的蔗糖，在弥漫着阵阵甜香的甘蔗田里奔驰着，可是对当年被长途贩运到这里，又终日劳作、不得休息的黑人奴隶来说，这个糖厂山谷绝不是一个甜蜜的地方。

蒸汽小火车的第一站，就停在了伊斯纳加庄园，那里有智慧谷的象征—伊斯纳加高塔。建于1840年的伊斯纳加高塔，共有7层、高35米，那清悦、悠扬的钟声曾经是糖厂上下工的标志。它现在是一座观景台，

在上面能够看到庄园的全景，当年是用来监视奴隶工作、防范他们逃跑的。高塔之下，一览无余，没有人可以逃脱自己的命运。

再走半个小时，就到达了蒸汽小火车的终点站——莫里诺斯庄园。这里是一个养牛的牧场，甘蔗、牛、烟草，曾经是古巴的三大经济支柱。

今天，这里的大部分居民是黑人奴隶的后代，他们还住在那些昔日作为奴隶集体宿舍的平房里，而奴隶主的庄园早已变成了游客游览的去处……



● 图今天，甘蔗田里还是有人在辛勤地劳作，田边堆积得小山一般高的甘蔗，并不是拿来讨好游客的工具，而是黑人后代们谋生的手段。摄影/**Bruno Morandi-DrgaonImage**



● 特立尼达蒸汽小火车老式的木制车厢。



● 莫里诺斯庄园附近的蔗田工人，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是黑人奴隶的后代，不少人还住在那些当年作为奴隶集体宿舍的平房里。



• 在智慧谷，马匹还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古巴蔗糖发展历程

有资料显示，古巴蔗糖出口量常年在600万吨以上，居世界第一位。一半以上的耕地种植甘蔗，蔗糖出口收入占外汇收入的80%，成为国民经济的命脉。究其原因，既与这里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更有社会

经济因素。

古巴地处北纬20度与北回归线之间，大部分地区属热带雨林气候，这种气候条件特别适合甘蔗生长。古巴又是一个狭长的岛国，海上交通便利。16世纪初，殖民者把甘蔗引入古巴；17世纪，他们从非洲运来大批黑人；18世纪中叶，蔗糖业逐渐超过烟草业和畜牧业；19世纪，在西部红土平原上出现了一批中小型甘蔗种植园。

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向古巴大量投资，兴修一批灌溉设施，使海拔不足100米的低地普遍种植甘蔗，蔗田面积占全国耕地60%以上，大型糖厂也相继建立。由于蔗糖业的不断发展，使古巴经济结构单一化，并造成了对美国的严重依赖。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政府将外资蔗糖企业全部收归国有。为了摆脱单一化的经济结构，古巴政府决定削减蔗糖生产，结果这一决定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古巴政府提出经济发展“相对优势论”，重新确定蔗糖业是古巴经济的发展优势。

今天，甘蔗田里还是有人在辛勤地劳作，田边堆积得小山一般高的甘蔗，并不是拿来讨好游客的工具，而是黑人后代们谋生的手段。你若是走进他们的平房里，他们很愿意在自己的家里请你喝上一杯咖啡，并加上很甜的、自己熬制的土蔗糖。

在伊斯纳加火车站简陋的站台上，我们遇见一位老人，他静静地抽着一个土比索一支的雪茄。岁月的苦难在他脸上刻下太多的纹路，或许他已经对生活漠然，任由世界各地络绎不绝的游人经过他的身边。在不动声色的蒸汽记忆里，智慧谷、特立尼达，乃至整个古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许变化最大的，就是这里的黑人后代—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无论做什么，他们都是自由的。

猜你喜欢


世界遗产地理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CHANGES
TOWNS
唐人街之变
他乡筑吾城
大飯店

点击阅读

四部电影、四个阶层眼中的古巴
电影揭开古巴神秘面纱

几乎每一部古巴出品或以古巴为主角的电影，都从哈瓦那开始。镜头慢摇，目之所及往往都会有一个站在某处楼房天台的视角，或者有些残破的年轻城市。海滨大道旁的海浪总会被岩石敲碎，它们前行的旅程在此处戛然而止，撞碎的水花会飞溅到马路上，仿佛在以这种方式诉说着古巴近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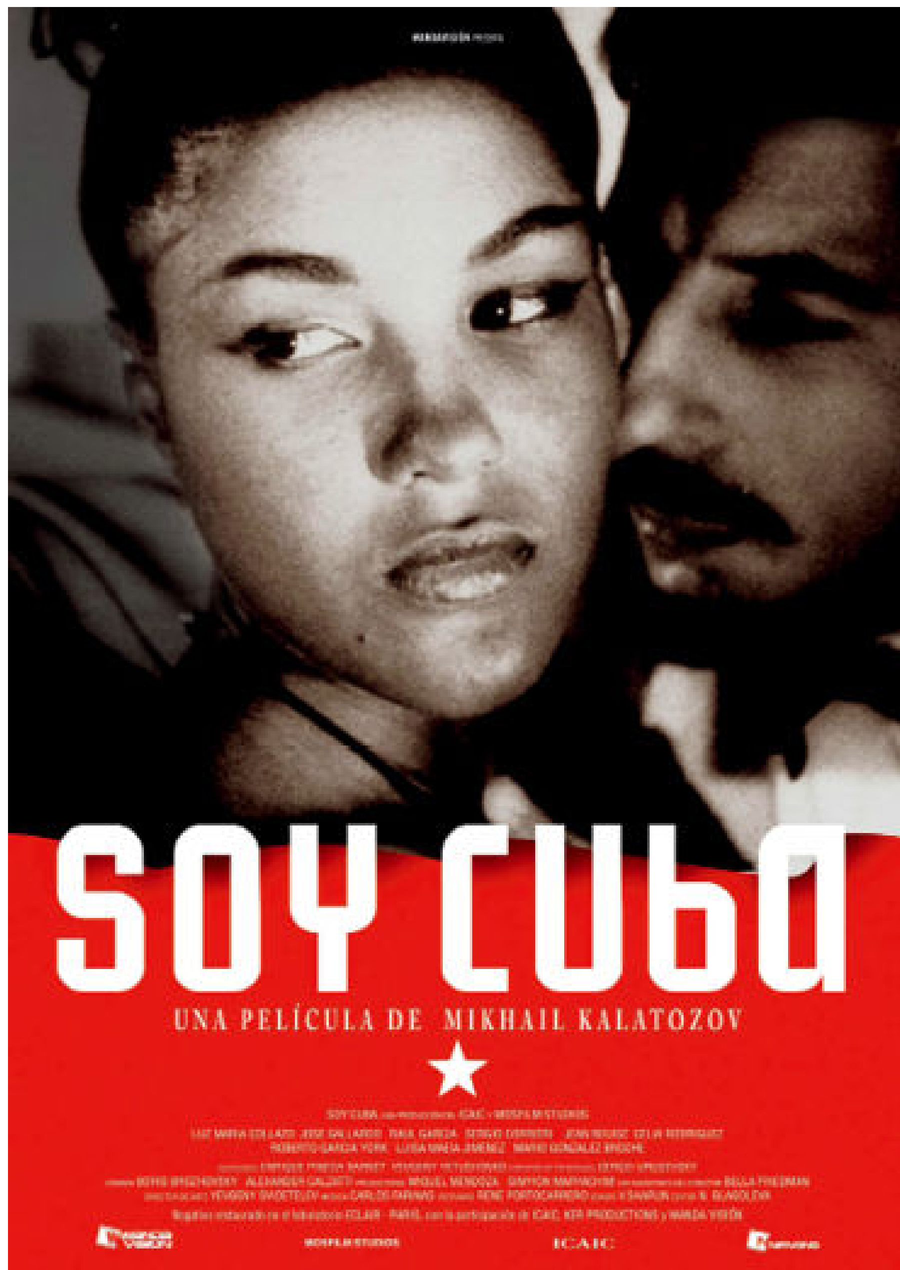
撰文/Heisenberg



● 电影《我是古巴》是了解古巴革命史的一个绝佳入口，这部电影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古巴革命刚刚胜利。卡斯特罗想拍摄一部关于革命的电影，并寻求苏联电影工业的帮助。

处在地球另一边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对我们来说是神秘的。但这种神秘跟我们的邻居朝鲜不同，是另一种形态。在一种可能是最极端的意识形态的交锋下，这里的文化，犹如两个巨大的地球板块猛然撞击，呈现出了让人感概万千的效果。同时，它跟整个世界又有很大的距离感—地理位置上它远离我们，文化位置上它又远离资本主义国家。当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很多国家纷纷改弦更张后，古巴依然在坚持，所以它算得上是老牌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自从古巴革命之后，古巴始终没有停止跟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一直保持着初生时浪漫而又残酷的状态。

所以，古巴是神秘的，神秘而激烈。它时而像是在给我们展示着最本质的自我，时而却又像迷失了方向，在路上不断找寻。



残酷史诗——社会主义者眼中的古巴成长

诗意的古巴历史，在米哈依尔·卡拉托佐夫上帝视角般的长镜头中游走。《我是古巴》是了解古巴革命史的一个绝佳入口，它不仅叙述了史实，更传达了灵魂。这部电影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古巴革命刚刚胜利，在卡斯特罗的带领下，古巴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卡斯特罗想拍摄一部关于革命的电影，并寻求苏联电影工业的帮助，苏联派卡拉托佐夫来到了古巴。

不过这首“电影诗”在尚未成熟的古巴观众那里并不受欢迎，苏联观众则觉得它的意境太过“清淡”而缺乏革命的气息。此外，在那个意识形态争斗强烈的年代，《我是古巴》上映范围仅限于社会主义国家，也导致它不可能接触到更多观众，故而被雪藏。直到1994年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在一场朋友的私人放映会上看到本片并惊呼：如果我们早点看到这部电影，现在的电影可能就是另一种风貌了！

长镜头在《我是古巴》中的运用，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电影一开始，当画外音以平静的口吻叙述着西班牙殖民者发现古巴，掠夺其资源，书写着“苦涩的甜”的这段历史时，镜头没有中断地跟随一只小木筏，在河道中徐徐前行。河道之上，则是普通古巴民众平凡的生活。

影片的第二部分从古巴的乡村来到了都市，而《我是古巴》中，“城市”就是服务西方侵略者的所在。“我是古巴，为了你，我是赌场，我是酒吧，我是酒店，我是妓院。”在一个顶楼泳池，卡拉托佐夫的镜头俯拍整个城市，这个摇臂镜头最终聚焦到了一个泳衣女郎身上。女郎走向泳池，镜头跟着她，紧接着女郎跳进泳池，这时镜头略晚几秒地跟到了水面上，旋即也潜入了水底。从水面到水下摄影居然连贯成了一个镜头，这对技术的要求很高，类似的长镜头充盈全片，跨越了物与物之间的界限，巧妙的镜头运用延展了观者的视线，也解放了观者的情绪。

《我是古巴》的第三部分，开始于佩德罗老头快乐的希望，最终却以绝望收场。他每天穿梭在自家的甘蔗园中，盼着甘蔗快快长高。值得高兴的是这年天气很好，甘蔗也不负众望地获得丰收。到了收割的季节，老佩德罗带着一双儿女在地里辛勤劳作，甘蔗园里响彻镰刀舞动的声音，如古巴民谣般动听。可是，甘蔗还没收完，地主就来了。地主通知他的这片地还有房子都不再属于他。地主走后，绝望的老佩德罗支开了儿女，用一把火烧了一切。此时，毫不知情的儿女还在村里载歌载舞庆祝，看到两人的高兴模样，村民们都猜测：老佩德罗今年的收成不错。

古巴的历史走到这个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了顶点，革命呼之欲出。电影接下来将镜头对准了一群革命青年，当既得利益者在城里散布卡斯特罗已死的消息，试图打击大家的革命决心之时，这些年轻人也在暗中策划一次行动，试图让民众了解真相。

低度开发的成熟或腐烂——中产阶级眼中的古巴成长

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古巴境内的意识形态之争或许是最激烈的。它几乎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而且美国就在家门口。1959年初，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民推翻了美国扶植的巴蒂斯塔政府。经过严密的筹备，两年后美国展开了反扑并占领了长滩和吉隆滩，吉隆滩战役爆发。这场战役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猪湾战役。战争的结果是古巴获胜。

电影《低度开发的回忆》就发生在这场战役前后，男主角是个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花花公子，他把父母和妻子送往了迈阿密，自己却留在

了古巴。

由于受到法国新浪潮电影影响，《低度开发的回忆》有着纪录片式的原始感，但这种感觉又可以分成两种层次。讲述革命事件时，本片完全采用了纪录资料片。在故事片中使用资料片是一种常用手法，但如此大篇幅使用还是很少，除了节约拍摄成本，也造成了一种割裂。仿佛这场在古巴街头巷陌发生的革命跟主角毫无关系，甚至完全不像是在同一部电影中。

当然就算导演没有采用如此富有疏离感的手法，男主角跟他周围的世界也是分裂的。哈瓦那的街道上，到处是枪战、游行、抗议人群遭受水枪攻击的场景，而我们的男主角此时却在湖中跟女人缠绵。这种看似“没心没肺”的生活，只是表象。男主角后来坦白：他无法跟这个国家的人民产生联系。这里的人没有能力积累经验和发展，因为喜新厌旧的人民不去思考，只是在追逐，在不断适应每一次危机。这正是男主角为何与环境格格不入的根本原因。他不是留恋旧日的优越生活，而是有意识地拒绝改变，拒绝被集体无意识赶着往前跑。历史的一系列变故后，他愈发对群体性的盲目感到哀伤，便愈加远离周遭的一切。

然而，人不能是孤岛。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古巴取得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一次胜利；而在个体身上，拥有小资情结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男主角，最终迎来了迷惘和空虚。

在这样一个历史变革极其戏剧化的国家，到底是跟随历史潮流热烈地活着更幸运，还是离开历史漩涡清醒地思考更幸福？我们不得而知。甚至，谁又能肯定，热烈了就无法清醒，清醒又何尝不是内心的热烈。就像男主角并不觉得38年的光影让他变得聪明了，而是什么还没经历就烂掉了。就跟古巴的热带水果一样，成熟得快，腐烂得也快。

在最美好的时光里死去——无阶级概念者眼中的古巴成长

除了青春、革命、雪茄，古巴也总是与音乐相连。古巴音乐，歌词述说各种故事，它甚至可以吸引维姆·文德斯跨越大半个地球，来到哈瓦那，探寻它魅力背后的故事。

在非音乐类的本土电影题材里，我们也总能看见古巴音乐的身影。在前文中提到的《我是古巴》兄妹俩在农村市集的载歌载舞的片段中，就有古巴音乐的体现。《古巴万岁》里也有古巴音乐的身影—马露被误认为是一个来表演《小红帽》的学生，结果她将错就错高歌一曲还上了电视。

马露的故事，开始于一场私奔。

这个世界上喜欢让孩子们私奔的导演不止是韦斯·安德森。因为私奔大概是这世上最浪漫的勇敢，而孩子让这件事变得更纯粹，这是纯粹的爱情历险。其实这样的私奔都是童话，只是在《古巴万岁》里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场不带政治色彩的革命。

生活在哈瓦那的小姑娘马露的快乐童年就要被强行改变了。她改嫁的母亲要移民了，并且写了一封信寄给远在古巴岛另一端的马露父亲，让他同意自己带马露出国。而马露却想继续留在哈瓦那，于是她跟最要好的朋友热吉托一起，从哈瓦那出发，穿过马坦萨斯、巴拉德罗、特立尼达，最终抵达卡马圭，这条线路几乎横穿整个古巴。两个孩子的理想虽然很渺小、很私人化，但对他们来说其分量跟切·格瓦拉年轻时横穿拉丁美洲无异。

跟韦斯·安德森式的私奔相同的是，马露和热吉托的行李包里也装满了对旅行无用、他们却很在乎的东西，比如奶奶的遗像。不同的是，发生在古巴的这场私奔里有很多社会元素。马露和热吉托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富有的和贫穷的、信仰“西方”宗教的和信仰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双方家长之间似乎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马露和热吉托一路经过的地点，也带有更多导演对古巴社会的观察和思考。特立尼达这座城市昭示着殖民主义时期的大量遗迹，巴拉德罗也是一座西化非常严重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刻画就像《我是古巴》里展示的城市面貌一样。

在距离目的地不太远的山区，两个小孩意外闯入了一个古巴“驴友”的帐篷。这个自称是地质学家的驴友，看起来却更像为了寻找自我甘愿在年轻时浪迹天涯的人。所以我们似乎有一种预感，他能完全理解这两个孩子的行为，或许还会帮他们一把。一切都跟预期的一样，地质学家载着两个孩子，来到了马露父亲工作的灯塔，孩子们在哈瓦那的亲人也同时赶到。

故事发展到这里，按照以往的观影经验，我们将在励志的情绪中看到“大团圆”的结局。但不要忘记，这是一部古巴电影。浪漫感建立在血雨腥风的革命之上，也就注定了马露和热吉托这场诗意旅行的终点并非“一切问题都解决”。没人被他们的行为感动，没人去重视他们离家出走的情感动机，问题还是问题，争执变成暴力。

或许，也只有他们最终朝向大海的纵身一跃，才能真正化解一切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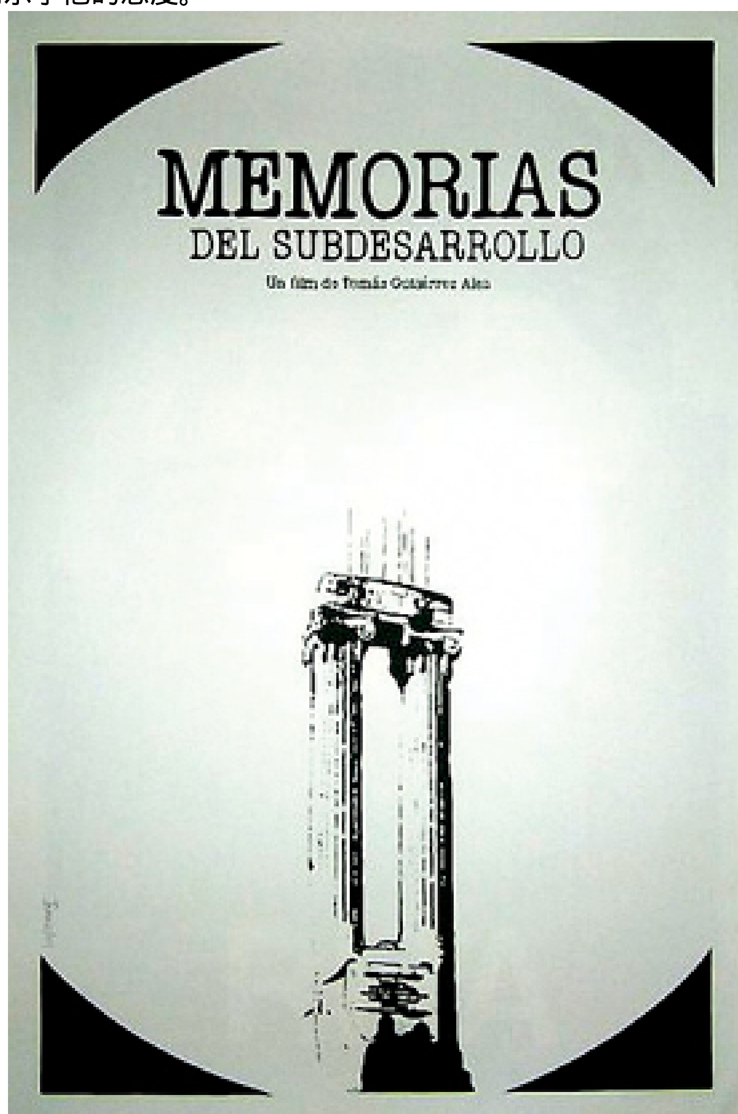
是对世界最简单粗暴的解读——虚无主义者眼中的古巴成长

2011年一部古巴制造横空出世，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影迷的注意。不过这部电影的类型却显得不是那么古巴—这是一部僵尸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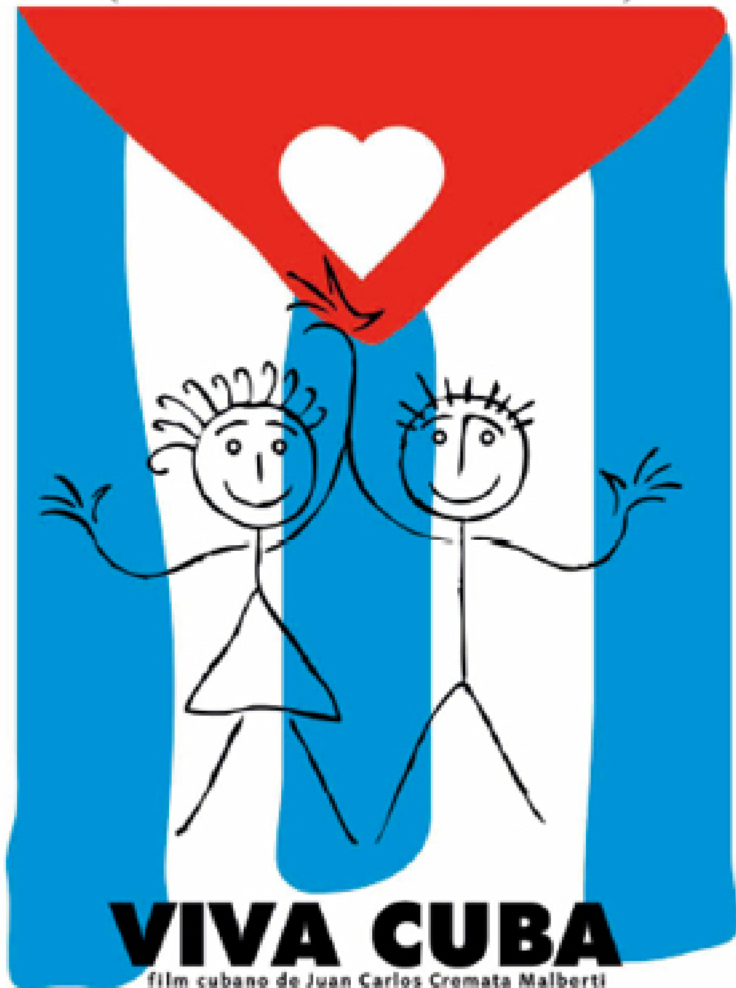
《僵尸胡安》有典型的英美僵尸片特征—片名和片名的美术设计明显都受到英国电影《僵尸肖恩》的影响，然而细节上却处处体现着古巴范儿。电影一开始，潜水捕鱼的男主角、男二号，就在聊要不要去迈阿密的事。在暗示自己能够度过僵尸屠城危机（当然戏中角色并无此自觉）时，男主角胡安的对白是：“经历过古巴在社会主义征程上面临过的各种艰辛，还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呢？”

说到这儿，似乎僵尸类型代表西方文化，僵尸吃了哈瓦那居民的大脑就像文化侵略。胡安这个“看清美国梦也没啥大不了，古巴才是天

堂”的角色，则捍卫了自己的立场。这种解读放在其他国家的电影里可能会过度，但在古巴电影里，它要么是隐喻，要么是对隐喻的嘲讽。但不要以为主角们说了爱国内容的话，就会以高、大、全的形象出现。比如胡安坐过牢，第一次捞到僵尸还以为自己误杀了人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别让人知道。又如，他前脚去跟前妻告白，后脚就跟邻居瞎搞。如果这还不足以暗示他的政治立场，那么后来社区唱国歌活动时，他的表现则完全明示了他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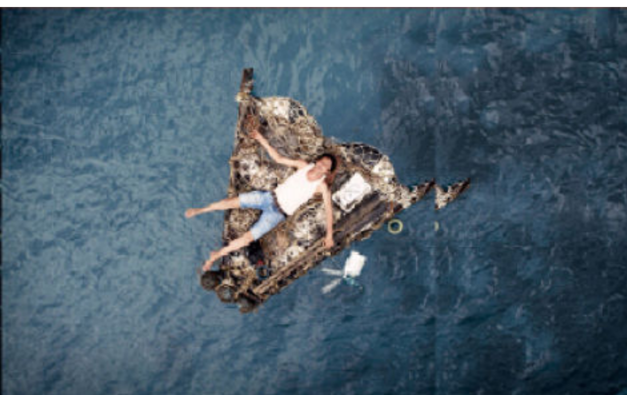


● 电影《低度开发的记忆》发生在吉隆滩战役前后，男主角是个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花花公子，他把父母和妻子送往了迈阿密，自己却留在了古巴。



- 电影《古巴万岁》里主人公马露的故事开始于一场私奔。这场私奔在《古巴万岁》里看起来更像是一场不带政治色彩的革命。





• 电影《僵尸胡安》有典型的英美僵尸片特征，然而在细节上却处处体现着古巴范儿。

这是一群社会边缘人，胡安、粗鲁的男二号、男二号不务正业的儿子、金链壮汉和同性恋——这群主流眼中的边缘人，不近不远地站在人群后面，对这种教条的形式丝毫不感兴趣。这群人是《僵尸胡安》的打怪主力。

他们到底是如何站队的呢？其实他们是一群生活很西式却又不会离开古巴的人，理所当然地觉得美国的月亮更圆。他们没有信仰。胡安隔壁老两口，老头先感染了病毒，在胡安之流怎么也杀不死他时，想到了用老头家的十字架给他驱魔。然而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仪式并没有什么作用，于是胡安用十字架爆了老爷子的头。电影进行到这里，胡安之流刚刚讽刺过唱国歌的，紧接着又嘲弄了信基督的，等于各赏五十大板。

细想来这种讽刺的喜剧效果背后却有颇多心酸。正是因为没有站队、淡漠政治、信仰缺失，胡安才能在其他人打算用游行抗议解决问题时，发现了真正的问题所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种政治形态、宗教思想，它们各不相让。一个企图征服另一个之后还想征服全世界，而这种争斗发生时，人经常要被迫放弃平和的生活并加入战斗。

浪漫和诗意，其实都是残忍无比的字眼。一如《僵尸肖恩》在反思现代都市白领的麻木，《僵尸胡安》也反思了信仰问题—显然两者都为各自国家的时代精神把了一脉。

记者亲历古巴禁区
推开关塔那摩地狱之门

自关塔那摩监狱开设以来，关于这里的各种新闻就屡见报端：虐囚、“烧钱”、关闭争议……这里一直是古巴与美国关系的晴雨表。法国特派记者专程前往关塔那摩，进入这座世界上安全系数最高的监狱，曝光最隐秘的囚犯的日常生活。

撰文/Bernard De La Villardière

摄影/Georges Mérillon-DragonImage

翻译/张蔷



• 高高的铁栅栏后面是关塔那摩“六号监狱”的入口。这是一个保持高度戒备的世界，任何一点走动都会被拍摄下来。这是一片游离于国际刑法之外的灰色区域。

在这个十月的清晨，看着眼前英式餐馆、高尔夫球场、漂亮的花园和静谧的村庄，置身于关塔那摩的我们仿佛觉得自己来到了法国的泽西岛。前一天晚上，我们把通行证挂在脖子上，在3位穿着米色粗布制服的新闻官的陪伴下，到达了这里。

关塔那摩基地一直是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晴雨表，两国在边境地区驻军的多少反映出双方关系远近的波动。在1962年底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这里还成为美苏冷战的最前线，据说美国当时还在基地部署了核武器以防万一。1995年7月，鉴于古巴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削弱，美国海军在关塔那摩基地进行的舰队训练和维护活动迁到美国本土和波多黎各进行，喧嚣一时的关塔那摩基地几乎回到了一百年前的寂静之中。



• 在狱警形影不离的陪伴下，记者贝纳德·德·拉维亚迪耶探索着复杂、深邃的关塔那摩监狱。他两旁是竖起的铁栅栏。宛如在漫漫长夜中的一场旅行。

踏入禁区

自从我们踏上这个坐落于古巴西南端的禁区的那一刻，新闻官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半步。我们的拍摄必须严格遵守他们提出的条件：尊重每一位访谈者的意愿，不在画面中出现他们的脸庞。我们不可能采访到、甚至都不可能随意碰到一位在押犯人。

关塔那摩和泽西岛的面积一样大，都是118平方公里，但是迎接我们的团队显然不是同一种风格。从迈阿密起飞，经过两个半小时的飞行之后，我们需要自己拖着行李和拍摄设备，一直走到停机坪的尽头，然后穿过一片有铁栏杆围着的篮球场大小的地方。

军事警察的警犬像X光仪一般检查着我们的行李。美丽的夕阳让这个场景增添了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在关塔那摩度假可能吗？我们在警察的陪同下坐上了一辆校车改造的公交车，随后乘船穿越海湾。这艘船还是越战时留下的。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有些上了年纪的女士。她告诉我说，她和已经退休的丈夫经常离开密歇根的家，来到这里休息。她觉得

在这里比在美国安全。

关塔那摩是美国境外最古老的美军基地，坐落在一个与美国没有任何外交关系的国家里。最初，美国和古巴两国商定，由美方向古巴政府交付每年4000美元的租赁费。但是自从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权以来，美国不再向古巴交付租金，而古巴也是几经要求收复土地而未果。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布什政府有了那个奇怪的想法，想在这里建造关押罪犯的监狱的话，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可能要永远被历史遗忘了。

首先投入运营的是X射线营地。在阿富汗被捕的伊斯兰极端武装组织成员正是在这里被关押了四个月。但是，直到2001年12月28日，关塔那摩监狱才正式成立。在这一天，乔治·布什颁布特令，允许无限期关押犯人。一年以后，关塔那摩共关押了600名犯人。2002年2月，X射线营地投入运营，然而四个月之后就被关闭了。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除去虐囚丑闻，整个X射线营地对美国的国家形象就是一个灾难性的毁灭。尽管“9·11”事件给了美国重重的打击，但是美国还是一意孤行，与大多数国家背道而行。

不知是过于天真，还是过于厚颜无耻，美军自己曝光了第一批监狱囚犯的照片。这些穿着橘黄色睡衣的囚犯被关押在露天的笼子里，就像家兔棚中的兔子一样。管理人员给他们配备了不透明玻璃做的眼镜，震耳欲聋的耳机，使他们隔绝于世。他们只吃粥糊，就地睡在草席上。关塔那摩成了现代的集中营，这里面甚至关押了未成年人。

也正是为了抹去这样的形象，关塔那摩邀请全球的媒体前来参观。新闻官非常小心谨慎，并没有向我们做过多的介绍。他们时刻注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要求我们严格遵守拍摄要求。“你们可以在监狱里进行跟踪摄影，但是不可以采访犯人。”三位新闻官沉默寡言，每个人的名字都被代号代替：MC1，MC2，MC3。MC的含义是Military Communication，军事联络之意。当我们提出要去参观X射线营地时，他们勉强地笑了笑，算是同意了。我们只能从俯瞰着监狱的小路上拍摄。营地周围长满了藤蔓和野草。在距离观察哨卡几步之遥、距离铁丝网千米远的地方，几处独立的房屋耸立在空旷的土地上。



● 关塔那摩的犯人们在**3000**多名监狱工作人员的日夜监视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 “五号监狱”的一间牢房里摆放着犯人们的用品：放在下面的橘黄色衣服是“令人头疼”的犯人的，放在上面的衣服是“听话”的犯人的。



- 设有铁栅栏的监狱医院。

匿名采访

X射线营地已经被德尔塔营地取代了。至今这里还关押着172名犯人，其中有93个也门人、二十几个阿富汗人。我们的参观从监狱医院开始。主治医师很乐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绝对不能让他出现在镜头里，更不能显示他的名字。他害怕在美国的家人遭到报复。

在关塔那摩，已经发生了好几起自杀事件。最让监狱管理层感到害怕的，便是绝食抗议。从2002年年初开始，已经发生了上百起自杀事件，从监狱管理层来说，阻止自杀已经成了反恐行动的一部分。

陆军上校向我们展示了导食管，医护人员在犯人自愿或者不自愿的情况下，把这种管子插到犯人的鼻子里。“做的时候，我们会尽可能温柔一点”，他解释道：“我们使用的是标准的产品，和美国医院是一样的，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管子从鼻子里插进去，一直伸到胃里。“依靠这种食物引导管，病人可以支撑好几个月”，军医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道。

对于他来说，如果说有些人是出于政治目的绝食的话，那么另一些人则是为了“换一换关押的环境”。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尽管国际红十字会的检察官每三个月来检查一次，但是他们的报告非常机密。

在德尔塔营地，监狱被逐一编号。从踏入监狱的那一刻起，管理员就告诉我们不能踏入“七号监狱”，X射线营是它的前身。这里可能关押

着“非常危险”、“非常有价值”的犯人。在他们当中，有卡里德· 谢伊克·莫哈迈德（Khalid Sheikh Mohamed），“9·11”的头脑之一。

“七号监狱”坐落于一个非常隐秘的位置，只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和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的成员才可以进入。在这个荒凉的地方，七号监狱非常容易识别。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前去一探究竟，因为狱警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们。

我们随后朝“五号监狱”走去。五号监狱的安全措施同样非常严格。走进监狱，仿佛走进了一个光线晦暗的水泥堡垒。穿过无数的走廊、无数的铁门，我们终于进入了监狱参观的“最精华”的环节：透过玻璃观看在押犯人。因为玻璃材质特殊，他们看不到我们。我们觉得很尴尬，但是我们的交谈对象丝毫没有这种感觉。

首先与我们交谈的是五号监狱的狱长。这里关押的并不是七号监狱“不听话”的犯人；相反，他们非常“听话”。但是，他们脚上还是戴着脚镣。两层牢房之间的楼梯上有一个铁栅栏，栅栏后面站着带武器的狱警。五号监狱的狱长也希望隐去真实姓名，他饶有兴致地向我们介绍在押犯人的权利：“学习阿拉伯语、英语、信息技术……他们还经常玩电子游戏，但是玩得都是一些最简单的游戏，一点都不暴力。”

这些犯人可以每周与家人通一次电话，或者在skype上视频聊天。接下来，我们在狱警的陪同下，参观了试点牢房。首先是厕所。所有设备都被固定在了墙上，是为了防止犯人们用盥洗设备袭警。一些犯人还会用“体液”骚扰警察。在监狱建立的最初几年，这样的案件发生了上百起。尿液、粪便、精液或者呕吐物，这些都是犯人们表达自己愤怒的方式。

为了挫败这种“游击战”，管理层设计了一种“储物箱”。管理人员有些得意地向我们展示着他们的发明：用一种带滑轮的小盒子把食物和饮料送到犯人那里，尽量避免身体接触。

依然在狱警的陪伴下，我们走出了德尔塔营地。铁栅栏把这个封闭的营地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在铁栅栏的另一边，有长满茂密高草的山丘，有成块的岩石，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攀岩。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大海，但是很遗憾，我们不能把它拍下来，“这可能会引起暴乱和越狱”，一个警察说道。“你害怕敌人的袭击吗？”我们问道。狱警谨慎地思索着这个刁钻的问题。随后，他平静地说道：“不，一点也不。在这里我最害怕的，是发生海地那样的海啸或者地震。”

事实上，在关塔那摩，最令人害怕的敌人，除了反复无常的地质变化之外，就是“坏心肠”的记者了。直到现在，负责接待我们的管理人员一直对我们保持着戒备，但是态度非常温和。直到我们与监狱总司令丹尼斯·托马斯交谈时，整个气氛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担任狱警已有22年之久。2006年到2008年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监狱担任监察官。我跟他谈起了巴格达中央监狱——阿布·格拉伊布监

狱的虐囚丑闻，并询问他如何在关塔那摩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我们这一代人无论如何也不希望虐囚丑闻再次发生。我们从中吸取了很多教训。我们的狱警时刻注意维护在押犯人的尊严。”狱长向我们强调，凡是虐待囚犯者，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几个曾经关押在关塔那摩的法国人回国后曾经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监狱对他们进行了“虐待和非法监禁”。有些案子现在还积压在巴黎的法院中。

我们的采访还在继续。“我看到有些犯人脚上戴着脚镣，这是为什么？”狱长的脸僵住了，他答道：“他们在自己的监牢里是享有绝对自由的，但是一旦我们把他们带到外面，比如去就诊、去上课，或者和他们的律师见面，我们必须确保安全。”这一说法与我们之前在五号监狱看到的并不一致：即使在室内，一个在学习的犯人也是脚上戴着镣铐被固定在地面上的。



• 三千多名工作人员日夜监视着关塔那摩监狱。

关闭争议

关塔那摩监狱已经设立了近15年。这里一直是个法律的禁区。联合国数次要求关闭该监狱，但是并没有收到满意的效果。

奥巴马曾经许诺关闭，但是已到他快任期结束，这一诺言实现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为总统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而共和党人并不准备帮助总统实现这一计划。

在关塔那摩关押的犯人中，大多数是2003年之前被收监的。时至今日，这些犯人依然没有受审。3000多名管理人员日夜监视着他们。毫无

疑问，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监狱。

在离开这个乔治·布什建立的监狱时，我们想起了奥巴马说过的一句话："关塔那摩可能是证明伊斯兰极端武装组织招募恐怖分子的最好的证据。"

Table of Contents

重返古巴：寻找革命的背影
古巴：废墟曾经辉煌
走出历史的古巴
哈瓦那：冻结在胶囊里的时光
“红色的切”世界偶像制造
圣地亚哥：古巴革命的背影
经典作家的古巴时光
特立尼达：苦与甜的迹忆
革命前传：古巴的殖民历史
智慧谷：为全世界种植甜蜜
电影揭开古巴神秘面纱
推开关塔那摩地狱之门